

李滂与白坚

——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之背景

高田时雄 撰；瞿艳丹 译

引言

1936年，李盛铎所藏敦煌写本计432件转入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之手^①。1938年11月，羽田选任京都大学校长后，将此经卷保管于校长室，凡有机会即进行研究。但二战末期的1945年夏，据提供资金者之要求躲避战火，被搬出校长室，疏散至兵库县的山中^②。其中也包含除李盛铎旧藏部分之外的写本，总计高达736件，现全部收藏于资金提供者经营的某企业财团图书馆，可以说是研究者之间公开的秘密。当中因李盛铎旧藏写本的流传来历可靠，且为有相当规模的收藏，作为今日所存敦煌写本最有望之矿脉，而成为国际瞩目的对象。那么，李盛铎所藏敦煌写本是以怎样的经过流入日本的？本文欲考察与其交易相关的重要人物——李滂与白坚，略探其背后之状况。

一、李 滂

1. 出身的秘密

李盛铎晚年，专事木犀轩藏书管理的是第十子李滂。李氏死后的1939年末，将木犀轩全部藏书以40万元转让给当时的北京大学的，也是此人，这是广为人知的^③。敦煌写本也是一样。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中加盖李盛铎数种印章，亦屡屡可见“李滂”之

-
- ① 高田时雄《明治四十三年（1911）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13—27页。参照其中《与李盛铎的因缘》一节。
- ② 有关此间之事，详见落合俊典《羽田亨稿〈敦煌秘笈目录〉简介》，《敦煌文献论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91—101页。
- ③ 苏精《近代藏书三十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28页。亦参考郑伟章《文献家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下册1532页；林申清《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218页。但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原载《文献》1980年第3辑，今据《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修订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431页）称卖给北京大学是1940年。可以预想，转让合同、交割图书、授受货款等各自时期大有不同，故而很可能图书最终运入大学是1940年；但现在追究细节与本稿主旨无关，因此不予多论。



图1 李滂印记

印记（图1），故可想象李盛铎晚年，李家的敦煌写本已委托李滂之手。李滂，字少微，1907年10月8日生^④。其称名多以字行，即李少微。继承家学，详于目录学，1930年代任北平民国大学目录学教授^⑤。说起这位叫李滂的人物，其实隐藏着出生的秘密，他是一位叫横沟菊子的日本女性与李盛铎所生，读者到底会不会惊诧呢？

但这一中国青年学者寻找心中母亲的事件，是昭和十年（1935）九月十日、十一日的东京各报刊的热门话题，是当时许多日本人闻知的事实。其经过可从此事不久后刊行的《李母横沟宜人传略》所收李少微《生母横沟宜人传略》（资料1）及白坚《书后》（资料2）中窥知。资料3-1至资料4-3附载的新闻报道，且不说故意使用假名，到处有与事实龃龉的部分，难以凭据，但在很好传达当时气氛的意义而言，是难得的材料，故而不厌其烦收录。对照其他材料，以下试简单回顾该事件之过程。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1905年9月25日），时任顺天府丞的李盛铎受命任驻比利时钦差大臣，而未及启程的九月，兼命加入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之列^⑥。出洋大臣分两组出发，如此李盛铎与载泽、尚其亨为后发一行，终于在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发向日、英、法、德、比诸国。在此之前，李盛铎已于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有前后约四年担任驻日公使的经历，日本是旧游之地。另一方面，横沟菊子是以日本劳动运动创始者而著名的高野房太郎（1868—1904）之夫人（图2）^⑦。高野因在日本的活动呈僵局之势，故而1900年往中国青岛经商，但不幸于1904年3月12日客死他乡^⑧。菊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日本，寄身亲戚家，勉强维生。因菊子略晓汉语，便到中国公使馆工作。其间过程虽不明了，但不久与李盛铎同行赴旅的菊子在比利时产下一子，这就是后来的李少微。李盛铎于宣统元年（1909）退任驻比利时大臣，回国居于天津唐绍仪之别宅时，菊子闻知东京所传消息云亲人病状危笃，便告别幼子，独自返回东京。那以后，母子无有相见之机会，经过了很长的年月。



图2 横沟菊子

④ 据李少微《李母横沟宜人传略》（1935年李氏刊本）。外务省情报部编纂《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1937年版）称其生于1902年，恐误。

⑤ 据前苏精、郑伟章书。据郑伟章氏称：李少微有关目录学著作有《千元考》《邺亭瞥观录》《近世藏书家概略》等，笔者尚未有机会寓目。

⑥ 此原为五人出洋大臣启程之际，因光复会志士吴樾投炸弹而有人负伤，故延期出发，人员亦有所调整。

⑦ 据《李母横沟宜人传略》所载照片。

⑧ 有关横沟菊子的生涯，因是高野房太郎之妻，有被日本劳动运动史研究者论及之处，尤以二村一夫《高野房太郎及其时代（99）》（《二村一夫著作集》第六卷，在线版）为详，且关口正俊《其后的房太郎》（《报告：情报劳连报告》2001年4月号所收《劳动组合的社会学》第53期）参考使用了上文的新闻报道为素材。

长大以后，对生母思慕之念益发严重的李少微，因熟人白坚屡屡东渡日本，便拜托他务必在日本探寻母亲的消息。1935年春，在上海，李少微对白坚这样说：“我是庶出之子，生母是叫横沟菊子的日本人。母亲与我分别，回到日本，已有二十五六年，杳无音讯。我非常想见她，但没有办法。因为你常去日本，能帮我找找么？”白坚应下，立刻致书友人江藤涛雄，说希望留意，不久江藤即回信，说非常佩服李君至情，但多方探寻，却无消息。前日寻诸卜者，卜者言：“横沟氏乃秋田县人，如今尚在世。近来或能相见。”故而7月末白坚去东京时，因有江藤氏之言，也怀有期待，但五十天过后，全无消息。9月9日，画家结城素明宴请白坚，席上，又提及寻找李少微之母的事，结城说最好是去警视厅。因此次日便去警视厅商议。东京各报纸闻讯后，便写成了煽情的报道，说这是国际的《心中的母亲》（译者注：长谷川伸著同名剧本，描写赌徒忠太郎为寻找幼时分别的母亲而四处流浪的故事），是现代的“和藤内”（译者注：即人形净琉璃剧《国性爷合战》的主人公，以郑成功为原型。而郑的母亲即为日本人）。

但因新闻效果显著，9月10日，住在东京杉并区的女性冈本小枝子见到晚报，次日凌晨立刻到赤坂山王酒店访问了白坚，告知横沟菊子后来的消息。冈本小枝子在上海结识菊子，回国后亦有来往，但悲哀的是，菊子已于大正三年1月22日病逝，年仅三十四岁。遗骨葬于驹込吉祥寺高野家的墓地，故而白坚与结城结伴前往墓地凭吊。李少微得知常年寻找的生母早已去世，据说面朝东海，捶胸泣血，不久振作起来，召开追悼会^⑨，祈祷冥福，同时刊行《生母横沟宜人传略》。此外，也有传言称后来李滂亲自到过日本扫墓^⑩。

2. 转卖敦煌写本

不过，要说上述探寻生母是白坚去日本的主要目的，却是怎么也不可能的。受李滂之托尽力寻母之外，一定别有要事。笔者推测，此事也与李滂的委托有关。总之，白坚于1935年7月来日本，秋初去东京之前皆在京都。是年7月，白坚赠予长尾雨山的书籍至今尚存，该书封面所记献呈词曰：“岁在乙亥盛夏七月，自上海来游平安之都，新得此集，谨以呈雨山先生吟坛。西充白坚。”^⑪据此，白坚居于京都毫无疑问的，但白坚在京都到底做了什么？联想到1936年2月以后，李家的敦煌写本陆续被送到羽田亨手

⑨ 中国东北某网站公开有青坡山人的绘画与瞿中溶、魏标、陈文述、徐渭仁的题诗，上下分列，附有收藏者李国文的《神游汲古醉诗香：青坡山人绘〈满城风雨近重阳〉赏析》一文。虽未见实物，难以断言，却是极为可疑的替代品，采纳尤可顾虑，但对我们而言很感兴趣的是，最下面添有李盛铎的诗，末尾注“乙亥秋日，李盛铎题，男少微录”，更钤有“支那考古学者/李滂实母横沟/大人追悼会印赠”之墨印，则为事实。因是“印赠”，则为印刷品，似可推测为发给列席追悼会诸人的纪念品。总之存在这样的东西，因此可确认，乙亥（1935年）秋，李滂召开了生母横沟氏的追悼会。又，该网站名“大东北文博馆”，地址是<http://www.ldb.cn/www/liguowen001.htm>（译者注：2014年1月，该域名已到期，故无法打开）。

⑩ 关口正俊氏又从法政大学名誉教授二村一夫处听来，向笔者披露了以下内容：李滂到日本扫墓后，欲访问同母异父的姐姐原田みよ，但据说因顾虑周围，并未直接会面，而是远远一看，却在太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成为话题。现为法政大学附属研究所的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1919年设立于大阪，横沟菊子的丈夫高野房太郎之弟高野岩三郎为首任所长，当时尚在此职。后揭资料4-1亦可见，高野岩三郎公开否认李滂是横沟菊子之子，故而原田みよ未与李滂会面，应该是听取了高野岩三郎之意而采取的措施。

⑪ 中林史朗《彩印本》，《大东文化》第468号（1995年7月），介绍郭祥正《青山集》中有此，网上亦可见。

中^⑫，那么，此时白坚正进行有关羽田与李盛铎敦煌写本转让事宜之商谈的推测，也绝非凭空想象。后面想详述白坚之事，而他就以这样的文物中介为生。

笔者并无其时白坚与羽田亨见面的证据。但资料3-1《东京朝日》的报道称：“一子李君，及长，学于我国^⑬，作为京都帝大羽田博士等所爱重之考古学研究者，确立了今日出色的地位。”又介绍了白坚所云：“李君虽年轻，在支那古籍版本研究领域是世界权威。京都帝大的羽田教授说提交论文来看。但其父说，你还年轻，等研究更深入些。因此不向日本的大学提交论文。”可知李滂与羽田之间，过去就有不少联系。1910年10月，羽田由内藤湖南介绍，造访天津英租界黄家花园的李盛铎宅邸，抄写景教经典^⑭。这是羽田与李家最早的接触，之后大概也有一些联系。李盛铎晚年诉讼缠身，经济困顿，陷入不得不考虑处理藏书的窘境。实际担当此任的是李滂，因此李滂在上海与白坚面谈之时，寻母毋宁为借口，物色敦煌写本的下家才是中心主题吧。白坚居于上海，李滂为商谈此事，特从天津过来。说到李盛铎转卖敦煌写本，《中央时事周报》所载《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为1935年12月，但其实可以判断的是，这一时期李家与羽田之间已谈妥此事^⑮。

为解决李家穷窘的状况，李滂竟至决断卖出敦煌写本之时，即便到生母的祖国寻找买主，也绝非不自然。毋宁说是李滂知道羽田亨对搜集敦煌写本很有热情，才接近他的吧。综上所述，李滂是李盛铎与日本女性横沟菊子所生的混血儿，或对生母的祖国日本怀有十分亲近之情，由是可见，李家的敦煌写本被带到羽田跟前的基础已充分准备好。

3. 其后的李滂

前文已提及，李家的敦煌写本转卖约五年后，李滂将李家全部藏书都转让给北京大学。那么，其时李滂过着怎样的生活？有关情况，不明之处很多，虽与本稿主题无关，但还是想记下仅知的一二事件。

注④言及昭和十二年（1937）版外务省情报部编纂《现代中华民国满洲帝国人名鉴》中，李滂一条解说称：“河北省太（大）兴县人。一九〇二年生。原籍江西省九江县。前驻日公使李盛铎第十子，母为日本人横沟菊子。曾任津浦铁路货捐总办。东亚经济协会调查部副部长，东亚协进会宣传部主任。考古学及目录学家。著书多关于考古学，另有《黄色人种存亡论》、《横沟夫人传》等。”这里未见上文所云民国大学目录

⑫ 上揭高田《北京访书始末》，21页。

⑬ “及长，学于我国”，是说留学日本，很难说这是事实，不过新闻报道，不必深究。

⑭ 其时情状，羽田如下写道：“十月七日，天津英租界黄家花园访李氏，轻易获此景教经典，年来渴望始得医。（中略）……大致阅览后，偶然得从北京同行来的杉村勇造氏之助，立即抄毕全卷百五十九行。李氏更欣然允诺拍摄，但不幸的是，是日午后，自己突然患病，遂失此机会，无比遗憾。”（羽田《有关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58年，271页）此外，其时同行的杉村勇造的回忆亦很好传达了当时的氛围，可供参考：“羽田先生常同我提起‘那时候’。那是昭和三年（1928）秋，二人访问隐居天津的李盛铎氏，抄写景教安乐经时。不但得见秘不示人之物，还获允抄写，因此先生大喜，我也与老人讨好闲谈，其间还拍下资料，后来研究刊行。这也令中国学者惊呆，因此是先生得意的场面。”（杉村勇造《回忆羽田先生》，《东阳市研究》14-3，附《羽田博士追悼录》，5页。）

⑮ 笔者曾认为，羽田看过该目录后，极为迅速地行动（高田《北京访书始末》，21页），但或许并非如此，之前已有私下约定了吧。

学教授之职，但提到东亚经济协会与东亚协进会等团体职名，同时可视为日本的居中斡旋者组织的团体^{①⑥}，可知李滂逐渐深入参与日本大陆政策的轨迹。寻母的新闻报道中已云：“出色的亲日派，目前在天津协助南京政府的工作。”（1935年，资料3-2）故可想象其时他处于亲近日本的立场^{①⑦}。但随着时局混乱渐深，李滂似乎也愈发与日本的占领行政相关。1940年3月，日本占领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一经成立，就担任其管辖下的河北省燕京道尹（代理），兼任燕京道区联合讨伐队总队长。其时有照片留下^{①⑧}。1942年6、7月，的确就任此职，有资料称存在文书显示，他为了挖掘“惠民壕”而从事征发劳动者的工作^{①⑨}。遗憾的是，有关抗日战争结束后李滂的情况，完全无从所知。

二、白 坚

1. 其人经历

如上所见，可以认为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归于羽田亨之手一事，很大的要因之一就是李滂特别的出生背景。但即便卖主是李滂，实行交易而必需的具体先期准备，自然还是不可缺少中间人。负责此任务的就是白坚（图3）^{②⑩}。对于这位今日似已埋没于历史洪流的人物，我想考证其发挥的作用。

白坚的传记并不清楚。幸而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载有此人，先看这段记载：

白坚（1883—？）字坚甫^{②⑪}，四川西充人。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毕业，担任国务院简任职存记、段祺瑞政府秘书厅编译主任、民国二十七年临时政府内政部秘书，兼任师范学院国文教席。向来于金石书画兴趣甚浓，亦藏古石经之残石，近来刊行所著《读正气歌图史集》一卷，盖为师范学院讲稿，又与同好组织“徐园诗社”。其余著作有《读汉魏石经记》、《石居获古录》（民国二十六年上海图书馆学校出版）等。



图3 白坚

①⑥ 后者尚有一点不明，但前者是1935年高凌霄等人以天津为据点、以“日支亲善工作”为目的设立的。

①⑦ 就任汪精卫政府之事想是无误。近年中国的著作，如“日寇侵华，曾至天津任日伪官员”（郑伟章《文献家通考》，1531页）、“李盛铎之子李滂在天津汪伪政府任职”（林申清《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218页）等文应别有所据。但桥川时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北京：中华法令编印馆发行，1940年）李盛铎条中所云“其子滂，字少微（以字行），亦颇有嗜书之癖，现为天津县知事”（116页），当中“天津县知事”之职无法确证。

①⑧ 《旧中国掠影》（*A Glimpse of Old China*），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1996年刊（2001年修订版），19页。承蒙关口正俊氏告知该照片的存在，谨致谢忱。

①⑨ 居之芬《关于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体系与强制劳工人数若干问题考》，《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135页。同作者《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罪行》，《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98页。

②⑩ 根据《东京日日新闻》昭和10年（1935）9月10日晚刊第二面。

②⑪ 又云坚夫、山甫，晚年似称白隆平。参照后文相关各处。

“徐园诗社”是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结成的诗社，加入的社员有中日爱好者。又组织雅言社，定期刊行《雅言》^②。桥川时雄亦为同好之一人，因与白坚认识，故而其记录大体可信。

留学早稻田大学后^③，回到中国，登记于“国务院简任职”（载于任官候补者名单）。简任职即民国时期的文官任用方式，最上有特任官，之下续有简任、荐任、委任，分为九等。其一、二等为简任职，直属国务院或国务总理。大概大学毕业的资格能得此职位，但也可推测不能很快获得实职。不久，1924年11月，段祺瑞临时政府一经成立，白坚似乎就成了秘书厅编译主任^④，应该是因为他的日语能力吧。1926年，段祺瑞因“三·一八事件”下野后，并不清楚是否还保留此职，但考察白坚之后的行动，可见这一时期他已辞职。民国二十七年（1938）的临时政府，自然是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师范学院即沦陷期设立于北平的国立师范学院^⑤。自任职段祺瑞临时政府以来，到再度供职于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中间约有十年以上的空白。其间，白坚究竟在做什么？这十余年才是与本稿主题密切相关的时期，有必要尽可能详细地调查。下面就逐一考察该时期白坚的活动。

2. 书画交易

从许多材料追考白坚的行动，可以看到他作为以书画为主的美术品之经纪人的形象。如桥川所述，“向来于金石书画兴趣甚浓”，白坚藏有许多书画名品。当初搜集时，或许是为了自己鉴赏玩摩。但不久也渐渐对转卖获利而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而转卖对象大部分在日本。

1924年后，在段祺瑞政府工作时，白坚从王树相处高价购入晋写本陈寿《三国志·吴志》残卷（资料5-2）。1930年，白坚将该吐鲁番写本转让武居绫藏^⑥。众所周知，王树相任新疆布政使约十年间，驻扎迪化（今乌鲁木齐），在任上入手了许多自吐鲁番发现的写本^⑦。另外，这些写本当中，有相当部分（古写经28卷8帖）已于1922年经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之手以二万日元之金额归中村不折之架藏^⑧。那么，白坚前后至少卖

② 《雅言》社长为傅增湘，庚辰年（1940）正月里每月刊行铅印线装本一卷。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数据库，该杂志刊行至1944年，但笔者能确认的最后一册是癸未年（1943）卷一。总之该杂志评议（员）中都能见到白坚与桥川时雄之名。

③ 但毕业生名册上并未载其名，故而在早稻田读书，或许并未毕业。桥川大概也只是照白坚所言记录。

④ 亦有任吴佩孚秘书长之说，恐为讹传。《邓拓收购名画风波（往事回顾）》，《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12月13日。

⑤ 1938年5月17日成立。王谟为院长，设置文、理、体育三科。国文组与教育伦理、日本语文、西洋语文、史地组共同构成文科。1942年末，师范学院与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直至战争结束。

⑥ 参照资料5-3。该写本于武居绫藏死后，又转归《朝日新闻》的上野家所有。赤尾荣庆《上野收藏与罗振玉》，《草创期的敦煌学》，知泉书馆，2002年，75页以下。

⑦ 中村不折言及自己的搜集过程，称“其后，以新疆省布政使驻扎迪化的王树相将其在任十年间出土自吐鲁番、鄯善、库车等地的经卷墨迹装作三十卷，以为爱藏之物，又卖得合适之价”，因而买下。中村不折《新疆与甘肃的探险》（《法帖书论集·解说》），东京：雄山阁，1934年，6页。

⑧ 锅岛稻子《关于不折旧藏写经类收藏》，《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亚出版文化之研究》研究成果，东亚善本丛刊第二集，2005年3月，卷下，第358页。

给中村不折数件写本。首先，是上文所述王树枏旧藏前接《三国志》残卷的十行断简²⁹。据资料5-3内藤湖南之跋，该断简似乎是将上述写本转让于武居绫藏前后而转入中村不折之手的。按常理，应认为这两种断简是白坚1924年从王树枏处同时入手之物³⁰。也就是说，将之分作两份各自卖掉。当然，这样做获利更多。此外，不折的旧藏写本中，可知经白坚之手者，尚有两种。一是【014】《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十四梁天监十一年写本，另一为【025】《佛说金刚波罗蜜经》梁大同元年写本。有关前者，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草稿中报告称：“……余令江藤氏割爱，与同氏（白坚氏）交涉中，因震灾而一时中止，又排除万难，其三丈五尺完整无缺之梁经终归敝斋。”³¹可确认是从白坚经长安庄江藤涛雄，再归不折所有的。其入手年代为关东大地震（1923）之后不久。但据该写卷所附王树枏之跋，可知该经卷乃王树枏赠予顾鳌（巨六）之物，因此，关于白坚到底是从谁那里得到，还留下了一点小问题。再说后者，因卷末可见白坚十一月十八日（但不知何年）识语，故而该写本至少一时为白坚所藏，是无可置疑的³²。应当注意的，是前者【014】《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第十四的入手年代，若说震灾后不久是事实，那么这不仅成了白坚与中村不折交易的最初之例，还成为白坚很早就着手书画交易的证据。若大胆想象，甚至连大正十一年（1922）自田中文求堂所购总共两万日元的经卷，也可认为背后有白坚。中村不折最早入手古写经是在大正三年（1914），是江藤涛雄从兰州购入的《草书经》三卷，通过田中文求堂交付。据说，存在标记为同年二月九日从文求堂以六百元购入该《草书经》三卷的记录³³。总共两万日元的经卷中，留有文求堂的收据，因此很难否定最后交货人也是田中文求堂。但在此情况下，比起王树枏→文求堂→中村不折这样的途径，是否能自然想到，在王树枏与文求堂之间还有哪位中介者？笔者虽也不能否认王树枏→白坚→江藤涛雄→中村不折这样的可能性，但是，这完全没有超出想象的范畴。

中村不折也购入了相当数量的梁素文旧藏吐鲁番写本³⁴。梁素文与王树枏同时期在迪化，任财务官员，二人争相竞购蒐集大量写本。现在，在日本国内，除了书道博物馆之外，其旧藏品还分散收藏于静嘉堂文库、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天理图书馆、京都国立博物馆³⁵。那么，现在北京历史博物馆（译者注：今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六朝写经残卷》虽也是梁素文旧藏本，但据所附吴宝炜（译者注：当作炜，下径改）跋文，云梁素文自新疆回北京后，其书法名品尽售予奸商白某，白某欲将之转卖日本，吴宝炜好

²⁹ 书道博物馆图录《禹域墨书集成》，图版序号【140】。以下言及书道博物馆所藏写本的情况，在“【】”中记入《禹域墨书集成》的图版序号。

³⁰ 中村不折还拥有其他的吐鲁番出土晋写本《三国志》（《吴志》卷二〇）（图版序号【141】，存25行）。因有王树枏之跋，故可知为其旧藏，但不知何时归入中村不折之手。并非全无白坚与之相关的可能性。

³¹ 上揭锅岛稻子《关于不折旧藏写经类收藏》，363页。

³² 上揭锅岛氏文中，自白坚处所得部分中并未提及该经卷。

³³ 上揭锅岛氏文，第358页。

³⁴ “其余也收入十卷左右迪化府吏员梁素文之物。”上揭《新疆与甘肃的探险》，第6页。据上揭锅岛氏文第361页，称实际计有十四卷，推测其购入时间为昭和二年（1927）后半至昭和五年（1930）秋。

³⁵ 另外，1990年左右，日本古书市场也出现了几种梁素文旧藏写本。因此有可能日本国内某处尚隐藏有相当之数。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90—191页。

容易才买下其中三卷^{③⑥}。这白某当然就是白坚。跋文纪年为民国戊辰（1928），与中村不折入手梁素文经卷为同一时期^{③⑦}。关于中村不折如何购入梁素文之写卷，还没有确切的证据。锅岛稻子氏介绍，存在“名白许曾者买下梁素文所藏品，转卖日本”这一说^{③⑧}，笔者推测，这个白许曾，实际就是白坚其人吧^{③⑨}。

不单是王树枏、梁素文的旧藏写本，白坚经手转卖到日本的古写本，似乎还有其他存在。且看以下内容。近年，京都国立博物馆赤尾荣庆氏等人对三井文库所藏敦煌写经开展了详细的书志学研究^{④⑩}。作为副产品而举办的展览会^{④⑪}、出版的图录等，记忆犹新^{④⑫}。幸运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有关旧藏者张广建及这些经卷归于北三井家所有的经过，也逐渐明朗。张广建是辛亥革命后，1914—1920年间的甘肃督军，是在此地确立绝对权力的军阀。发现藏经洞写本的王道士之前给安肃道台廷栋呈献过相当数量的写本，而1917年廷栋一经横死，这些写本便全数归于张广建收藏^{④⑬}。1928年，张广建所藏写本经其时在北平的田中三郎之中介，归于北三井家^{④⑭}。据说田中三郎在北京经营医院的同时，似也积累了不少以古钱为中心的古书画等方面的收藏经验，因这层关系，与新町三井家当时的主人三井高坚遂有交际。该敦煌写本原也应为新町三井家购入之物，因某些理由而归于北三井家^{④⑮}。不过，看叶恭绰1947年所写《张谷雏所藏敦煌石室图籍录序》

③⑥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晋唐写经 晋唐文书》，1999年，京都：柳原书店，211页，插图13。

③⑦ 不折入手梁素文旧藏写本的时期，不如说可以据此跋文再缩小范围。

③⑧ 前揭锅岛氏文，361页。惜乎并未说明这“一说”的出处，无法追究更多。

③⑨ 白坚卖给不折的，不仅有吐鲁番写本，还有汉代熹平石经与魏正始石经之残石。据锅岛稻子《有关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与中村不折收藏》（《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图录》，2000年4月，4—5页）：“不折于昭和十七年（1942）自中国学者白坚处购入此十三片残石”，魏正始三体石经之“断碑亦归不折所有”。石经可谓白坚的专门领域，自己亦有相当数量的收藏，有《汉石经残石集》（民国十九年）、《魏正始三体石经五碑残石记》（民国二十五年）之专著。笔者调查，归不折所有的熹平石经似为《汉石经残石集》所收之物。又，书道博物馆所藏三体石经（第三石、第五石）亦收录入《魏正始三体石经五碑石记》，但白坚曰第三石“今此石归日本中村不折家”，第五石“此石今存西充白氏与石居”。如此说来，可知第三石比第五石更早、（无法断言是否购自白坚）至迟民国二十五年（1936）以前已归不折所有，第五石稍迟，于1936年后某时期从白坚转入不折之手。

④⑩ 《关于敦煌写本书志的调查研究：以三井文库所藏本为中心》，2000—200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报告书，基础研究（C）（1），课题编号12610068，2003年3月。

④⑪ 三井文库别管展示室，2004年度新春展《丝绸之路的至宝：敦煌写经》（会期：1月17日—2月22日）。

④⑫ 财团法人三井文库编《三井文库别馆藏藏品图录 敦煌写经：北三井家》，2004年1月发行。

④⑬ 富田淳《有关张广建》，《关于敦煌写本书志的调查研究》，32—33页。又，图录《敦煌写经》，54—55页。

④⑭ 现在，九州大学文学部也藏有数种田中三郎旧藏敦煌写本，据说是田中三郎死后，1949年九州大学从其子田中三男氏处购入之物。坂上康俊《九州大学文学部所藏〈敦煌文书〉之来历》，《史渊》第141辑，2004年3月，1—24页，是追考田中三郎其人极有趣味的研究。田中三郎与中村不折似也有若干交易，不折曰：“再者，洛阳出土朱书绥和四年之锡壶为其时居于北京的田中三郎氏送来。”中村不折《新疆与甘肃的探险》，10页。又及，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卷首装饰有该锡壶。

④⑮ 清水实、樋口一贵《三井文库所藏敦煌写经之传来与调查之经过》，《关于敦煌写本书志的调查研究》，17—21页。同文修改订正稿亦载于图录《敦煌写经》的47—53页。三井文库中留有田中的交货目录，封面有“昭和三年（1928）六/十一月田中三郎两度自北京带来，今并町三井家收购，‘支那’甘肃督军张广建所藏敦煌发掘古写经目录”，可知是田中三郎卖给北三井家的东西。另外，目录末有“右价款总额一万六千五百日元也”，可知购入货款。该目录全部照片刊载于上文报告书中12—16页。

（资料7），记述“厥后张广建所得约二百卷，大半归西充白坚”。若此说可信，则张广建的写本在某一时期几乎尽归白坚所藏。当然，叶恭绰撰写此序的1947年，并不知张广建旧藏敦煌写经已于近二十年前离开白坚之手，归三井家所有之事。连接田中三郎与白坚的材料现今并不存在。但可从交货目录末的金额明细中明确记载的“金一千五百日元 田中三郎手续费”中想象，交易时田中三郎只不过是单纯的中介人。既然没有此前白坚还转卖给谁的证据，目前且认为白坚是以田中三郎为中介人而售予三井家，应该也合适^{④6}。

不论中村不折还是三井家，交易方都是东京方面。然而白坚与京都的关系又是如何？在此略观其与京都学术界的联系。1925年，内藤湖南从白坚处接手唐写本《说文解字》残卷。现在被认定为国宝、藏于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的该残卷，是湖南作为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与同僚共赴北京时，在端方那里见到的^{④7}。那之后，难解不舍之情、等待入手之机的湖南，于大正十四年（1925），终于得到获取此种天下奇珍之机会，但险被白坚抢先。种种交涉的结果，最终是白坚割爱给了湖南。据翌年拜访湖南恭仁山庄的白坚在此《说文》末尾所书识语称^{④8}，他从罗振玉处听说了湖南渊博的学问，亦有私淑，经江藤涛雄说服，同意转让^{④9}。还写道，中国政情不安定，典籍多有遭灾厄者，此书藏于平安之都，值得高兴。至少该时期，白坚与京都学派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

昭和六年（1931）4月27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提交给外务省岩村成允书记官的《东方学报·京都》的分发名单中，近末尾处可见白坚之名^{⑤0}。该名单首先列举了图书馆、大学、研究所等机关，接着列举出个人姓名，而个人的情况几乎都为大学教授等著名学者乃至文化人，如白坚这样的存在是罕见的特例。中国人中还有钱稻孙，但被列举作泉寿文库^{⑤1}，故而可说，白坚是中国人个人当中唯一之例。大概可称表现白坚如

④6 上揭富田淳《有关张广建》中有“张广建收藏品的一部分，经白坚之手，于昭和三年（1938）归三井家所有”，究竟依据为何？没有提供任何依据，不过重要的是与笔者的想象一致。

④7 当时湖南所记跋文中，有“庚戌十月（1910）初四，陶斋尚书见示唐写《说文》，真天下奇宝也。我邦亦曾有此书数行，今已不知落在，可惜。同观者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泷精一、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也。日本内藤虎次郎拜识”。归国后，明治四十四年（1911）二月十一、十二日两日召开的“报告展览会”中，该写本的照片作为“端方氏藏”而被展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 报告展览会目录》，第19页。

④8 根据杏雨书屋编《新修恭仁山庄善本书影》所载照片，10页。

④9 但该场合下实际的交易中也有中介者，是湖南爱去的博文堂的原田实。湖南与博文堂的书简一为大正14年（1925年）12月9日与原田庄左卫门，一为同年12月22日与其子原田悟朗（《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所收，569、570页）。与白坚的识语不同，写的是更为实务的事情，可知入手价格约三千圆，运送时为慎重而使用外务省公文邮件。白坚虽也说到赠呈湖南花甲纪念的美谈，但实际是明明白白的买卖。

⑤0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东方文化事业关系文件《有关东方学报分发对象一事》（6-162-5）。

⑤1 泉寿文库是钱稻孙经营于私邸、以日本书籍为中心的收藏。该名单中钱稻孙之名写成钱汤孙，当然是误记。

何深入京都中国学界的事实。白坚似乎常来日本^{⑤2}，其主要目的都应商业。1929年，与傅增湘父子同行来日本时，将希望白坚做翻译的傅增湘扔在旅舍，而到处忙自己的事，颇令傅增湘不快（资料8）。

以上絮絮谈论了白坚倒卖文物之事，是因现在还不存在直接证据，说明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是李滂通过白坚归于羽田亨之手的事实，故而尽可能想要提出情况证据。白坚至此已有将敦煌、吐鲁番文献卖与中村不折与三井家的经验，充分了解日本对于这样的文物有强烈兴趣。随着与京都学者交际渐深，也一定非常了解京都对敦煌写本有所需要。特别是羽田亨想要有组织地推进敦煌写本的搜集，经费方面亦有有力后盾，因此也有可能平时就请白坚介绍购买敦煌写本。故而可以想象，白坚听说李滂有意转让李家敦煌写本之时，立刻就去商谈。《东京朝日新闻》报道中的“为京都帝大羽田博士等所爱重”、“京都帝大的羽田教授说提交论文来看”等介绍（资料3-1），当然是基于白坚的谈话，但白坚特意提出羽田之名，应该是此前刚在京都见过羽田的印象还留在脑海中之故。

3. 其后的白坚

也可以说是职业关系，白坚比李滂的活动范围远为广阔，交友关系也极丰富。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白坚之名散见于各种文献。虽然多少有偏离本稿目的之嫌，还是将管见所及有关其后白坚动向的情实与文物有关者介绍二三。

首先，1937年年末，白坚为将陆机《平复帖》转卖日本，欲入手而未果。这件中国国宝级文物的书法作品，当时是溥儒（心畲）所藏。其时张伯驹听说溥儒将所藏韩幹《照夜白图》经上海商人卖与外国，担心这幅书法作品也流入外国，便以傅增湘为中介，与白坚竞争，强行购入，价格四万元。据说，白坚称若转卖给日本人，就是二十万也能容易卖出^{⑤3}。1956年，张伯驹将之捐赠国家，现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白坚在获得文物方面似乎相当有手段，经他之手，许多逸品来到日本。但也不是常常都顺利，有时也会失败。这则轶事就是失败的一例。

1942年年末^{⑤4}，日本军的一支部队在南京发现了玄奘的遗骨，成为很大的话题。该

⑤2 董康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从长崎到上海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一日，晴。晨起，检点行篋。九时，见窗外长崎丸停泊山下。别居停主人、诣领事署辞行，时（张）羽生领事尚偃卧，至东滨町二枝鳖甲店购饰物数事。登舟遇南京总领事须磨、静嘉堂文库职员今关并白坚甫，今关赠余四僧诗一册。坚甫则由长春回，询问辽左情形，与日本新闻无异。午后一时出帆，遥见羽生在海岸致别，盖伊来时余适在客座与诸人谈话，旋即箝鸣，遂仓促登陆也。四时许，风浪骤作。晚餐仅五六人。预作函致小林。”（《书舶庸谭》卷七）据此，白坚似于1933岁末前往东北长春，1934年1月来日，又去上海。这虽不过是一例，却是问题的1935年前一年之事。可以推测，在此时期，他每年都往来于中日之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汉魏石经拓本集《汉熹平石经残字》（民国二十四年拓本）、《汉熹平石经残字》（民国二十五年西充白氏拓本）、《魏正始石经残字》（民国白坚辑，民国二十四年拓本）、《魏正始石经残字》（民国二十四年西戎白氏拓本）及《魏正始三体石经五碑残石记一卷》（民国二十五年西戎白氏与石居排印本）。全为白坚赠与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据图书室保管卡，记录了“白坚甫先生捐”“白山甫先生捐”“白山甫君捐”等。大概想象是白坚自己带来的东西，如果该想象不错，白坚在1935年之外，1936年也访问过京都研究所。

⑤3 张伯驹《陆士衡平复帖》，《春游纪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4—5页。

⑤4 准确说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十二月二十三日。

遗骨由日本军交给当时的汪精卫政权管理。次年2月23日，中方以褚民谊、日方以重光葵大使为首，举行了官民多人出席的盛大交接仪式^{⑤⑤}。同时进行分骨，玄奘遗骨被分作五份：一送洛阳白马寺，一与广东七十二烈士之墓合葬，一经日本大使馆去东京，一安置于南京九华寺，最后一份送往北京。担当移送北京任务的人当中，似乎有作为南京居民代表的白坚^{⑤⑥}。若是如此，这一时期白坚就住在南京，因为《中日文化协会两周年紀念特刊》（1943）末尾所载《南京中日文化协会会员名册》中亦可见“白坚”之名，所以大概确是如此。上文所见北京师范学院之职，或许此时已辞去。但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10月，白坚还留有担任华北民众团体反共大同盟理事长时《立即返回正义日本之往事》的谈话^{⑤⑦}，并不知他是否一直在南京。或许在运送玄奘遗骨之后，也留在了北京。至此，是战争前期白坚的动向。

可以预想，新中国成立，对于一直以来立场与日本极亲近的白坚，意味着严峻时代的到来，但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不过，因白坚晚年的状态有一二流传，姑且介绍一番。

这是1955年的事。某位对金石书画颇有兴趣的老人，偶在重庆市郊外化龙桥李子坝古董摊发现了一尊古老的小砚。凭一直以来的经验，一眼即知其价值，遂迅速买下。不久，该砚由友人白隆平（即白坚）带到北京，卖给当时吉林省博物馆馆长张伯驹。此古砚就是曹寅旧藏、与《红楼梦》有渊源的珍品“脂砚”^{⑤⑧}。如上所述，张伯驹曾是竞争陆机《平复帖》的对手，而这次从白坚处购来此物，也是因缘吧。

另外，1961年某日，名叫白坚夫的老人拜访了邓拓，说想卖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对苏东坡艺术怀有浓厚兴趣的邓拓，一见此画即倾倒，设法以5000元巨款买下。另一方面，据说白坚在见邓拓之前寻求各方买家时，也有人怀疑为赝品，满怀愤懑与无

⑤⑤ 参照春日礼智《玄奘三藏之遗骨发现》，《日本》，昭和18年（1943）5月号，37—39页，谷田阅次《大报恩寺三藏塔遗址发掘始末》，《支那佛教史学》第七卷第3号（1944），13—20页。特别后者是发掘后从事实际调查的负责人之报告，很贵重。

⑤⑥ 此外，代表南京佛教会的宝华寺妙原和尚、北京临时政府要求出马的五台山爽痴大师、还有代表官界的参赞武官张恒等人，为了移送而同乘准备好的飞机。当事者之一的张恒晚年写下了当时的情况。张恒《在南京发现的唐玄奘遗骨》，《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227—229页。根据该文，其时情况似如下所述，是传递当时气氛之一端的逸话。飞机一起飞，妙原和尚道：“爽痴大师，你是北京佛教会派来的专使，你义不容辞地捧着骨灰盒坐在中央，代表当年取经时代的沙僧；白坚居士，你也许是白马的化身，那你坐在爽痴前一座上，代表他（玄奘）骑着你的象征。参赞武官张恒，既是武官职又是中央钦派的官府专使，那你坐在右边负责保卫玄奘，无疑的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我是小庙里的和尚，造诣也浅，只能取猪八戒这个角色了。”

⑤⑦ 木村英夫《民族的咆哮：秘录·圣战与皇军之实态》，东京：云母书房，1995年，310—314页。编者木村氏介绍白坚是“在于华北有根据地的反共大同盟及敬天会中有指导地位的老斗士”。

⑤⑧ 现藏长春吉林省博物馆。胡邦炜《脂砚芳踪：一件与曹雪芹有关的历史文物的故事》，《历史知识》1981年第4期，53—56页。该文章亦记述，白隆平即白坚。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940页有“脂砚即端方旧藏，由重庆白坚甫携来北京”。白隆平之名，大概是战后白坚用的化名吧。近年网上公开有关玄奘遗骨的纷杂记载中，也不用白坚，多用白隆平，但当时并非已用此名。大概是知道白隆平为白坚的人，以谈到玄奘遗骨移交典礼时使用后来的名字为依据，经辗转复制而来。又及，白坚很早似乎就对古砚有兴趣，1928年（民国17年）1月，在以后藤朝太郎来京为机缘而召开的“中日古砚会”上展出了藏品。《文字同盟》第11号（1928）“学艺大事记，一月”有“杨啸谷、谢树生、袁励准、白坚甫等，均陈列其所珍藏之逸品。而叶恭綽、辜鸿铭、袁励准等，亦来参观”。

可奈何。因而面对邓拓给出的正当评价，自然是遇见知音般喜悦至极。邓拓购入此画，后来在中国文化界引起很大波澜，但因为太偏离本稿主题，在此不予赘言^{⑤9}。总之，可以看出晚年的白坚经济困窘，靠一点点变卖手边藏品维生。另外，亦可想象，他对自己一直以来的经历与眼力并未失去自负之心。以上，探讨了以书画等交易为中心的白坚之经历，令人钦佩的是，与白坚相关的文物皆为极致的一流佳品，可见他在这一领域见识之高。

结 语

虽然重复多次，但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经白坚之手归于羽田亨，并不存在任何一条直接证据。但综合白坚经手其他有关敦煌吐鲁番写本的过程，及当时围绕李澂与白坚的种种状况，可认为此二人扮演了核心角色的可能性极大。李澂对母亲的祖国，在感情上怀有很强的亲近感，将李家的敦煌写本售予日本，应无心理上的抵触。问题是如何寻找买家。白坚对日本市场的动向比一般人更熟悉，在探寻、辨别最佳顾客的能力方面，是旁人无法企及的专家，而常常也有必要给买家提供优质商品。两者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若报纸上热闹的寻母美谈背后，达成了这样重要的交易，那么必须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附表 白坚相关年表

年代	事件
1883年（明治十六年，光绪九年）	出生（四川西充人）
1922年（大正十一年，民国十一年）	12月，中村不折自田中文求堂以二万元购入王树枏所藏古写经28卷及8帖
1924年（大正十三年，民国十三年）	自王树枏处重价购入晋写本陈寿《三国志·吴志》残卷（后经武居绫藏归于《朝日新闻》的上野家）
1925年（大正十四年，民国十四年）	12月，内藤湖南从白坚处接手唐写本《说文》
1928年（昭和三年，民国十七年）	在北京召开的“中日古砚会”上展出藏品
1928年（昭和三年，民国十七年）	是年，购入梁素文吐鲁番写本多种
1928年（昭和三年，民国十七年）	北三井家通过田中三郎以16500元购入张广建旧藏古写经131种
1929年（昭和四年，民国十八年）	9月，与傅增湘同来日本

^{⑤9} 有关其始末，参照苏双碧、王宏志《邓拓收购名画的风波》，《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65—68页。惟据该文称，白坚也购入持有苏东坡与《潇湘竹石图》同时期另外的画卷《枯木怪石图》，但这已在早期卖给日本。曾经，此画似乎确为日本某氏所藏，但现在下落不明。日本也呼作《枯木竹石图》，迄今《书道全集》第15卷《中国·宋I》（东京：平凡社，1954年）之图版90，Oswald Sire'n, *Chinese Painting* (London & New York, 1956-58, Vol. III, Plate 180) 等载有此画照片。此外，湊信幸《关于宋人所绘枯木竹石图》，《铃木敬先生还历纪念 中国绘画史论集》（吉川弘文馆，1981年，241页注25）亦曾言及。

续表

年代	事件
1930年（昭和五年，民国十九年）	出版《汉石经残石集》、《景真本东坡颍州祷雨诗话》一卷附《考证》一卷。转让晋写本《三国志》残卷与武居绫藏。同一时期，转让别种《三国志》残卷与中村不折
1931年（昭和六年，民国二十年）	为张元济、傅增湘往返于上海、天津之间
1931年（昭和六年，民国二十年）	《东方学报·京都》分发名单列表中有白坚之名
1934年（昭和九年，民国二十三年）	年初来日
1935年（昭和十年，民国二十四年）	7—9月来日，搜寻李滂之母横沟氏。就羽田亨与李家的敦煌写本之转让进行谈判（？）
1936年（昭和十一年，民国二十五年）	2月以后，羽田亨陆续入手李盛铎所藏敦煌写本
1936年（昭和十一年，民国二十五年）	于上海刊行《魏正始三体石经五碑残石记》
1943年（昭和十八年，民国三十二年）	春2月23日，于南京参加玄奘遗骨移交仪式
1943年（昭和十八年，民国三十二年）	10月，作为华北民众团体反共大同盟理事长，留下《立即返回正义日本之往事》的谈话
1955年（昭和三十年）	将曹寅旧藏“脂砚”卖与张伯驹
1961年（昭和三十六年）	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以5000元卖与邓拓

该年表以有关白坚自身之事为主，但也列出没有直接相关证据的事项，以做参考，并加灰色背景作标记。

资料1 生母横沟宜人传略

生母横沟氏，讳菊子，日本国埼玉县人，后居东京吴服桥畔，以受优婆夷戒法，号梅薰贞香。光绪乙巳，家大人先后拜出使比利时国及考察各国政治大臣之命，以是年十二月莅。明治天皇款洽优渥，居芝离宫。时母年二十五，议侍家大人赴比国，与在沪眷属同行，居使署凡三载，温恭淑慎，克尽厥职，岁丁未十月八日生少微。宣统己酉，随侍还朝，至天津，寓香山唐少川丈别墅。适得东京讯，以亲老病剧，归宁情切，时时啜泣，家大人感其诚，许之。时少微甫离怀抱，顾复恩甚，怜恋小子，泪忽忽承睫，悲咽不成声，盖人生之惨酷矣。癸丑夏，家大人再游日本，谒明治天皇桃山御陵。后至东京，母来会，欲相将返国，但以亲年益耄，侍养无人，踌躇再四，实难两全。因以玩具寄赐曰：“使儿他日睹物兴怀，毋忘海外有母也。”少微童昏，不知其悲。洎长念母，始切形诸梦寐。叠向东友访问，卒无确耗，默计异日学成自立，当亲往海东访省，以伸乌私，以慰圣善。今岁之秋，西充白山夫坚渡日本，少微重恳探询，因晤冈本小枝子、小林万子两女史，始审吾母以大正三年岁在甲寅一月二十二日卒于东京芝区金杉町寓所，计年三十有四，葬于本乡区驹込吉祥寺佛殿之前。乌虓！有愿未偿，吾母竟长逝耶。睽隔辽远，存没不闻，生缺定省，死阻音问，东望海天，椎胸泣血。有儿如斯，抱恨曷极。悲夫悲夫，谨濡泪和墨，书其大略。先后助少微寻访母氏者，西充白君外，有天津李鹤仙松年、日本结城画伯素明、白岩子云丈龙平、江藤氏涛雄、和田氏昇一，附识于末，以志不谖。

仓龙乙亥孟冬，德化李少微泣譔。（据1935年刊《李母横沟宜人传略》）

资料2 读李子少微生母横沟宜人传略书后

……（前略）今年春，少微十兄在上海相晤，一日语坚曰：“吾固家大人之庶子也。生母姓横沟氏，名曰菊子，日本人也。别而还国廿五六年矣，缺绝音邮，思欲见之，其道无由。子时往日本，冀为寻之。”坚感其至诚曰：“诺。”即驰书东京之友江藤涛雄氏，乞其留意也。未几，得江藤书曰：“感李孝子至诚，已多方寻之，未能得。昨者询诸卜人，卜人曰：‘横沟氏为秋田县人，今固生存，不久当见之云。’”七月之末，坚游东京，思因江藤氏而获见之也。待之五旬，终不获也。九月九日结城素明画伯召余饮，因为语李子寻母之事。画伯曰：“兹事舍访之警视厅，终无得也。厅中之一国人名至悉，尔者有八十年前之一人，凭之得其所往踪迹，可概见也。”翌朝因往警视厅人事相谈课，具道其详。其第九席主者，主寻人踪迹者也。俄而新闻记者纷集，不移时而孝子寻亲新闻遍全国矣。十一日朝侵晓，有冈本小枝子女史者来余所居之山王旅馆，出写真一纸曰：“此李子所寻之母也，没已二十二年矣，葬之吉祥寺域中。”即驱车与结城画伯偕诣吉祥寺，得其墓而扫拜之。至是乃得其详焉。（后略）……

乙亥岁十月中，西充白坚识于天津。（据1935年刊《李母横沟宜人传略》）

资料3-1 托友寻人的支那青年学子，所寻乃横沟菊子（秋田县人）。警视厅亦助一臂之力，国际《心中的母亲》

曾为驻日支那公使的父亲与日本妇人之母所生、而今真挚的考古学研究者，居于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二〇一的亲日学子李昭睦（30岁），无论如何都想找到自小分别的心中之母，通过友人，九日一再恳求警视厅人事商谈处帮忙。

李君之父李盛金氏三十二三年前任支那公使，派驻东京，不久荣迁比利时公使。其时同伴的日本妇人横沟菊子即今李昭睦君所寻的心中母亲。自比利时诞下一子李君，三年后母亲与父亲、爱子作别，独返日本，乃确凿事实。其后父盛金氏归支那，任国民政府参议院院长之要职，一子李君及长，学于我国，作为京都帝大羽田博士等所爱重之考古学研究家，确立了今日出色的地位。然思母之心愈切，游学日本时曾访卜者，亦曾向友人多方询问，但及至今日无论如何也不知秋田县人横沟菊子之下落。最近，获知同为考古学研究家、居于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树德坊三街六号的友人白坚氏往日本视察，即与白氏详述母事，请求帮忙。白坚氏亦同情李君心情，如今暂住赤坂山王酒店，某日与日本画家结城素明氏商谈，被告知可往警视厅人事商谈处。遂再三恳求该处，该处亦感于李君悲哀之情，立刻移交防范处，着手寻找心中之母秋田县人横沟菊子（现年五十二三岁？）。

“若找到，便请同行回天津。谈及李君心情的白氏。”白氏于山王酒店道：“李君虽年轻，在支那古版本研究领域是世界权威。京都帝大的羽田教授说提交论文来看。但其父说，你还年轻，等研究更深入些。因此不向日本的大学提交论文。但他是日本学界亦认可的青年学子。我认为他将来会是作为中日两国亲善的纽带而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然可担心者，他因从事与南京政府相关之工作，若被知道是半个日本人，恐怕会遭排日同事的厌恨、而给工作带来障碍吧？因此本欲尽可能不公开他姓名，悄悄寻母。但因毫无进展，遂求助于警视厅。若寻得母亲，且情况允许，李君打算访日，并携母返津。同时，我将在此滞留二三周，若能早日查明，根据情况，亦可由我请回。”（《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年（1935）9月10日晚报第二版）

资料3-2 年轻支那考古学者的烦恼，日本母亲在何处。卅年前驻日公使李氏之子，请求警视厅探查

如今的支那少壮考古学者、原驻日支那公使公子，思慕日本妇人的“生母”，恳求查找——八日晨，目下暂住赤坂山王酒店的支那考古学者白坚氏（52岁）造访警视厅防范处，申请“友人之子希望见到日本妇人的母亲，故而无论如何都请帮忙寻找”，而这位友人，即三十年前的驻日支那公使（后为北京政府参议院议长），如今住在上海安度晚年的李盛铎（78岁）氏的公子李昭睦（30岁）氏（化名），是现今支那一流的考古学者。故事要回溯到三十年前，李盛铎氏尚为驻日公使，在日本任期，与秋田县人横沟菊（52岁）结下私情，其间生下昭睦君。之后李盛铎氏为比利时公使，因往他地赴任，故与“阿菊”分别，仅带走昭睦君一人，离开日本之土。然而当年幼的昭睦君长大后，父亲李盛铎氏讲明“你的母亲是日本女子”的秘密，眷恋生母的昭睦君心焦难耐：“无论如何都想见母亲一面。”数年前亦特派人来日本寻找，然所思念的母亲仍消息杳然。而昭睦君如今居于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二〇一，成长为优秀的考古学家，因而心愿“一定想让母亲看到出色成长的自己，让她高兴”，遂于卜者问母之平安，曰“尚在世”，大喜。托为考古学研究而赴日的白坚氏搜寻母亲“阿菊”，因此三周前来东京的白坚氏与友人结城素明画伯商谈后，出面去警视厅。

“白坚氏语：继承母亲血统的亲日家。”暂住山王酒店的白坚氏道：“李盛铎先生是江西省九江县人，三十二年前的光绪廿四年，任驻日公使，客居日本两年。其后视察欧美，历任比利时公使，第一次革命之际为山西省民政官。晚年为参议院议长，是活跃的有名望之人。昭睦君亦是继承乃父风范的优秀政治家。八月初，早听说我为美术研究要去日本，困于思母的昭睦向我讲明这种恳切心情，拜托我去东京，能不能想办法寻找母亲。昭睦先生尚未来过日本，也不会日语，但因继承母亲骨血，是优秀的亲日家，目下在天津为南京政府做事。”（《读卖新闻》，昭和十年（1935）9月10日晚报第二版）

资料3-3 留在记忆中的日本母亲、怀念今天的“和藤内”。原驻日公使之子无计可施而请求警视厅搜查

三周前起暂住山王酒店的支那考古学家、上海法租界姚主教路树德坊三街六号的白坚氏（52岁），于九日晨至警视厅拜访吉冈防范科长，受居于天津日本租界的李昭纬氏之请，请求搜查廿七年前与李氏别离的生母横沟菊子女士。李昭纬氏之父为二十余年前的驻日公使李盛铎氏（78岁），当时受雇支那公使馆的是横沟菊子女士。李公使之后转任比利时公使，菊子女士相伴赴任，在当地生下李昭纬氏。其后，昭纬氏三岁时，菊子因故作别，回到日本。尔来廿七年，李公使今已自政界隐退，过着悠然自适的生活，昭纬氏在天津埋头研究考古学。而中日之间关系紧张，昭纬作为日中亲善之纽带而活跃的同时，也为搜寻心中的母亲而东奔西走。近来，前述白坚氏赴日之际，受昭纬寻母之托，与友人结城素明画伯商谈的结果，是去请求警视厅。父李盛铎氏为进士出身的老官僚，日清战争后任驻日公使，两年后历任比利时公使、山西提法使、山西民政长、江西省议员、参议院参政，宣统六年任农商总长，八年为参议院议长，之后退隐。

“秋田的妇人，白坚氏之谈。”“李昭纬君虽年轻，却是有名的考古学家，为内藤湖南博士所知。一心想要再见一回三岁时便离别的母亲，因此还求问过日本的卜者，苦心搜寻。听说这位横沟菊子确为秋田县出身。之后我打算去京都，请求搜查。”（《东京日日新闻》，昭和十年（1935）9月10日晚报第二版）

资料4-1 国际心中之母。廿年前辞世，今为幻之母。比国归来寂寞晚年。白坚氏亦失望

支那青年学子李昭睦氏（30岁）通过友人白坚氏到遥远异国日本寻找的心中之母横沟菊子已于二十一年前病死，如今，戒名“梅熏贞香信女”亦寂寞长眠于驹込吉祥寺墓地，化为幻之母，此事已明了。

十日晨，居住杉并区天沼二之五七一的妇人冈本小枝子到赤坂山王酒店造访白坚氏，开场白是悲伤的一句“你们寻找的菊子夫人已不在这世上”，并告之全部事情。据说菊子夫人年轻时嫁给法学博士高野岩三郎氏的兄长房太郎氏，育有二女，但因房太郎氏不久客死青岛，菊子便携二女来到东京。伴随李氏之父盛金公使去往比利时，即为其时之事。自比利时归来，不知为何独自寂寞生活在芝区金杉二之二七，大正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死去。之后因高野家同情，得与房太郎氏合葬。白坚氏立刻出面到警视厅，感谢其尽力。但或许是想到年轻友人的伤心，无意中流露出的落寞之姿，也令警视厅众人心痛。

“小枝子女士说。”杉并区天沼二之五七一的冈本小枝子说：“二十四五年前，与横沟女士在上海相识。横沟之前是高野房太郎的夫人，但因高野客死青岛，便带两位女儿中的妹妹美代子回国，途中顺道至上海。此后在东京与李先生结婚，是从信上知道的。与李先生同去比利时，途中也经过上海，玩了两三天。自比利时回日本后，寄居东京亲戚家，其时我亦回东京，因而有交往。似乎她是受高野一家的照顾。”

“不能相信这个孩子。”（高野岩三郎博士谈）〔大阪电话〕横沟菊子女士的小叔、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高野岩三郎博士追忆菊子在世之日而讲述道：“看贵刊报道，见横沟菊子之名，且有去过比利时之事，因也想到嫂嫂。但年龄一条并不符合，以及秋田县出身，于是简单想，大概是同名异人吧。菊子嫂嫂是当时东京吴服桥一流出租会场的小姐，是颇具名望的江户子、亡兄房太郎之妻，常常共同行动。但因明治三十七年房太郎病故青岛，便携两个孩子归国，暂居敝处。后来，菊子尚年轻，因而由我收留了两个碍手碍脚的孩子，离籍恢复横沟旧姓。但因后来出入支那公使馆，故而也有明治三十九年随公使去往比利时之事。大约是明治四十二年吧，我第二次出国旅行之际，在比利时与她亲密会谈。其后不久，她便独自回国，大正三年在东京冷清染病，她是经我之手诚心埋葬在东京吉祥寺，与亡兄之墓并列。而且我在比利时见她，以及她回国之后，完全没有听说其间她新生了孩子的事实，因此无法取信。从嫂嫂那里收养、由我抚养成人的孩子们，有一位病死，但另一位侄女极好地长大了，如今嫁给某良家，已做了母亲。那之后过去三十年的今日，出现了自称横沟菊子是心中母亲的人，我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信。”（《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年（1935）9月11日晚报第二版）

资料4-2 唐人公使的“阿菊夫人”，李君梦之生母悲哀无言的墓石，长眠于有来历的吉祥寺

父为支那人，母为日本人，意想不到的命运下诞生的支那年轻考古学者、原驻日公使李盛铎氏之公子昭睦（30岁）（化名）君超越国境的母子深情之爱——“母亲啊，若还在，请出现吧。”仿佛是这一念相通。但年月流逝，生死不定之人，伸出温暖的手说：“啊，我可怜的孩子呀！”这位母亲，如今已化作一片无言白骨，尔来廿二星霜，不问异境异种已然成人的我儿，冷冷地、安静地长眠。以“八百屋阿七之寺”（译者注：江户时代前期，江户本乡水果店的女儿阿七，为与恋人重逢，不惜纵火，而被处以火刑。该故事广为流传，多见敷衍。而阿七与恋人相遇之所，据传即吉祥寺）。闻名的本乡驹込吉祥寺，寺内墓地一隅，苔藓丛生的一方单薄墓石，不知为何，戒名“梅熏贞香信女”也

留有一缕浪漫气息，长眠于此的，就是这位母亲——不是皮埃尔·洛蒂的“阿菊”（译者注：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法国小说家、海军军官，曾两度访日，以自己的长崎体验写过《阿菊夫人》一书），而是面目全非的、唐人公使的“阿菊”。

“阿菊以前是高野博士兄长之妻。与夫死别后，自上海归国后的国际恋爱，大正三年寂寞而逝。”十日晨四时许，前几日向警视厅请求搜查、祈祷着“生母”出现、在山王酒店打盹的白坚（52岁）氏被响起的电话铃打破晓梦。打来电话的是杉并区天沼一之五七一的冈本小枝子（62岁）女士。电话说：“您寻找的横沟菊子女士，廿二年前已去世……”震惊的白坚氏一面迅速请来小枝子女士，一面请求关系亲密、很照顾自己的挚友结城素明画伯来访。上午八时，冈本小枝子造访了山王酒店。据上海时代以来就与菊子相识的小枝子所言，横沟菊女士是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法学博士高野岩三郎氏的兄长、正金银行职员高野房太郎氏的夫人，与在上海分行工作的房太郎同往上海，因丈夫在任上死去，阿菊带一女美代子回到日本。其后，与当时的驻日公使李盛铎氏相识，结下奇缘。明治三十二年，李氏转任比利时，阿菊亦同往彼处，在那里产下昭睦氏（此前报道称抛下她，为误报）。之后数年，异国梦一般的生活迎来了无望之日，阿菊将爱子昭睦留在李氏身边，独自返日，僻居芝区金杉二之二七号，在高野岩三郎的资助下过着清贫的生活。大正三年一月廿二日，因病以三十四岁之龄寂寞而逝。据说是岩三郎氏治丧，将之葬于高野家的菩提寺、本乡驹込吉祥寺町的吉祥寺。听说这意外的故事，白坚氏由小枝子女士指引，电话联系画伯同赴吉祥寺。寺中墓地一隅，青苔覆盖的一座墓碑，刻着“高野家之墓”的石碑，便是阿菊夫人长眠的墓所。寺中记事本上亦载有“横沟菊”之名，确为所寻“日本之母”的另一重完全不同的模样，于是白坚氏亦流泪默祷。

“至少想让李君来扫墓。白坚氏感慨道。”扫墓毕，回到山王酒店的白坚知道挚友“心中之母”已临他界，面带忧伤道：“我虽想尽快告诉焦急等待消息的李昭睦君，但他听到这话一定会很悲伤吧。听冈本小枝子女士讲了去世前的菊子夫人的晚年，似乎是独自寂寞生活，也不幸福。但好像高野岩三郎博士为报兄长之恩，每月给菊子夫人寄生活费。据冈本女士说，这高野家的墓地中，也安葬着菊子夫人的遗骨。因冈本女士出席了菊子夫人的葬礼，所以应该没错，希望高野博士能再好好回忆当时的情况。要是搞清楚情况，李君最近也一定会赴日扫墓。但我想，因为李君明白了母亲去世前的情况，悲哀之中必也会有喜悦。”

“看到报纸想起来了。冈本女士说。”将阿菊夫人葬在本乡吉祥寺一事告诉白坚氏的冈本小枝子女士，回想当时道：“无论如何，这已差不多是二十四五年前的旧事了，因此我完全忘了。但看到昨日的晚报，一下子就想起来了。于是，对阿菊之事很了解的我就想出面，便给白坚先生打了电话。把阿菊很不幸、已经亡故的消息告诉李先生，很觉抱歉，但这或许也是命运。不过这样，李先生也充分了解了情况，就能安心了吧。”（《读卖新闻》，昭和十年9月11日晚报第二版）

资料4-3 如今的“和藤内”之母，已悲哀长眠地下。浪漫史装点了不幸的半生。葬于吉祥寺墓地

已报道，原驻日支那公使李盛铎公子李昭纬氏请求警视厅搜查心中的日本母亲横沟菊子，十日晨，家住杉并区天沼二之五七一的冈本小枝子阅读了此则报道，造访了暂住山王酒店的白坚氏，告知有关横沟菊子后来的消息。但据冈本女士的信息，已确认菊子夫人如今是亡人。冈本女士在菊子夫人去世时，亲为治丧收葬，关系亲密。据她说，菊子是法学博士高野岩三郎的兄长房太郎之夫人，曾在青岛生活，但房太郎客死青岛，抛下菊子夫人与两个女儿。故而菊子归国，后来菊子与爱女别离，同李公使共往比利时，生下李昭纬。因某些情况，菊子与他们分别，回到日本。后来，大正三年一月廿

二日，以三十四岁而亡，戒名“梅薰贞香信女”，葬在以八百屋阿七而闻名的驹达吉祥寺墓地。听闻此讯的白坚氏知道菊子夫人已去世，非常沮丧，到警视厅感谢他们尽力帮忙，说：“日本报纸的巨大反响令我很吃惊。多亏如此，很快事情就明了了。但听说已是亡人，便茫然若失，很沮丧。”此外，白坚氏与商谈对象结城素明画伯并冈本女士，于同日上午十点，往驹达吉祥寺凭吊菊子之墓。但不是独立的墓碑，而是确认与已故的高野氏等人同葬于高野家墓地。在住持指引下，向高野家墓地敬献香花。翻看该寺记录本，书有“横沟菊，大正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卅四岁”。

“‘至少把照片送给爱子吧。’白坚扫墓后道。”投宿赤坂山王酒店、代李昭纬氏寻找如今的“和藤内”心中之母的白坚氏，十日因获知菊子夫人的消息而大喜道：“今早四点半左右，我还睡着时，有一位不认识的冈本小枝子女士来电话，说菊子夫人已去世，并详细知晓当时的情况，故而立刻请她来酒店。之后结城素明氏亦来酒店，与冈本女士三人同往吉祥寺扫墓。即刻修书告知李先生。另外，从冈本女士处得到的一张照片也随信同寄往天津。我想他一定会高兴吧。”

“在大矶去世。冈本女士语。”“亡夫在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时，我便与菊子夫人相识。已是二十四、五年前的事了。菊子夫人在青岛与高野房太郎氏死别，其后从上海回东京，似乎去了李先生门下。当时必须结婚，来了上海，但回东京后也暂有交往。大正三年，于大矶（译者注：位于神奈川县南部、濒临相模湾，以海水浴场而闻名。）去世，似乎是高野家料理身后诸事。”

“菊子夫人的先夫，是我们劳动运动的前辈高野房太郎氏。”〔保田发〕有关高野房太郎氏，大内兵卫氏道：“虽不知横沟菊子其人，但她的丈夫高野房太郎氏明治二十年左右在美国，为美国劳动运动的先驱者龚帕斯（Samuel Gompers）所爱重，回国后，是在日本进行劳动运动的人，是片山潜的前辈、翻开日本劳动运动史第一页的人。劳动运动失败后，因穷困而去往青岛，明治三十四、三十五年左右客死他乡。遗孤中有一位是仓敷纺织公司原田技师的夫人。”（《东京日日新闻》，昭和十年9月11日晚报第二版）

资料5-1 白坚《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跋》

右晋人书《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自《翻传》“权于是大怒”之“怒”字以下，至《温传》“臣远境”止，计八十行，行十四、五字，有十六字者，中有蠹缺，余存字一千九十许……（中略）……余为西充产也，西充文献，有史以来陈寿氏为最尊，兹何幸此书之误，由余小子校正之，私幸何穷，愿天下治《三国志》者，同正斯误也。上虞罗雪堂藏有元康年写经，持以相校，风格姿态，正是同时，陈寿氏晋元康间人也。卷中有雌黄四处，想见当时讐校之精审。此卷出自新疆鄯善土中，今年秋至都，或曰当是北凉时，讲之中土，藏之其地者。旦夕展观，令人不知今世有蜗角蛮触之争。甲子冬十一月既望，西充白坚识于都门仲山甫才斋。（《支那学》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1925）8月，83页）

资料5-2 罗福成《晋写本三国志吴志残卷校字记》

晋写本古籍，中土至为希见。此卷长五尺，计八十行，每行字数多寡不一，首尾残缺无年月。近年出土于新疆省吐鲁番，为予友白君坚发见，遂以重值得之，珍如拱璧。（《支那学》第3卷第11号，大正十四年（1925）8月，82—83页）

资料5-3 内藤湖南《晋人写〈三国志〉残卷跋》

自西域墟墓石室中出古简牍卷帙，汉晋人手迹，皆得目睹于二千载之下。但其卷帙率多佛经，至

于经史百无一二。余遍阅内外收储，其乙部最古之本为瑞典人歇丁博士所获于楼兰废墟《战国策·燕策》断简，小隶书，止七行。余睹诸独国莱不室古典馆，盖魏晋之间书也。在我邦则武居君所藏三国《吴志·虞翻陆绩张温传》残卷隶书八十行晋人书，出于吐鲁番土中，为王陶庐树枏所获，既归戈斋白坚，白坚再归之于吾友武居君。是二本者实为宇内无上秘笈矣。古本吴志与今本异同之处，陶庐尝举三十三事，然尚有遗漏者。《陆绩传》“志存儒雅”，今本“存”作“在”，《张温传》“故屈卿行”，今本“故”上有“以”字。又有校语误者，陆张二传皆云“吴郡吴人”也，元刻本、毛刻本并与此同，陶庐谓今本陆传删“吴郡”二字，《张传》“吴郡”下删“吴”字者，未必然也。又《虞翻传》“翻子竦”，今本作“耸”，陶庐以古本为笔误，张传“功冒普天”，今本“普”作“溥”，陶庐谓宜从古本，则太拘，古字通用者，不须改也（中略）……武居君已获此本后，白坚复获其残简十行，归诸中村不折，乃《虞翻传》文，宜接此本前，余获其照片，因临写于左方，便读此本者，并考焉。昭和五年八月。（《湖南文存》卷五，今据《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筑摩书房，1976年，129—130页）

资料6 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六朝写经残卷》吴宝炜（宜常）跋

梁素文自新疆归燕，所有名迹全市于奸商白某，贩售东瀛。予与白某奋斗，得购留三卷。此卷写经十四段，前四段及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各段，皆晋人书；第五、第六段，六朝人书；第九、第十一、第十四各段，隋唐人书。王晋老所谓科斗笔法者，实章草笔意耳。各段各有妙法，即其劣处，知（亦）非今人所能及。此我国古时文化所在，惜以个人之力未及保存于万一也。民国戊辰（1928）吴宜常识。（《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第11卷《晋唐写经·晋唐文书》，京都：柳原书店，1999年）

资料7 张谷雏所藏敦煌石室图籍录序

盖敦煌石室藏物之散出，可分为数类，一为史坦因所取，二为伯希和所取，二者世已周知，三则当史坦因未至之前，已有少许散出，盖亦王道士辈之所为，缘村人喧传可以治病却邪，故恒出资向道士索去供养，地方官吏亦恒有用为馈赠者，前后当有数百卷。厥后张广建、许承尧、莘寿枢等所得，殆皆此类，盖出土在先而集藏在后也。张、许、莘皆于民国初年官甘肃。四则清宣统二年由学部调取后付存今北平图书馆之九千余卷，其到京以后之中饱，诚如谷雏所闻，其时官中册报有卷数而无名称及行款字数，故一卷得分为二三，以符原数，其精英皆归李氏，次及刘幼云廷琛，李之亲家。又次及李之戚友，其得分惠二三卷至十数卷者亦不鲜。五则史坦因伯希和以外德意志、日本、美利坚各图书馆，亦曾得大批，其时间不详，殆皆在运交学部之前或随后别于当地搜购者。

综上所述，由敦煌整批流出之图籍，不外此数。厥后张广建所得约二百卷，大半归西充白坚，以后闻又散出，许承尧所得分批售出，余曾与友人共购得七八十卷，余皆零售，莫可踪迹。莘寿枢所得不少，或尚在其家。其散在国外者，闻英、美、德、法今皆无恙，独日本所得藏之旅顺图书馆者，恐已毁失矣。

至李、刘、何所得，何早卒，除其生前赠友者外，余闻亦归李氏。世金知李、刘二氏多佛经以外之典籍，偶露鳞爪，固难窥其秘也。近年李、刘皆去世，所藏始分别散出，余曾介南京图书馆购入二百余卷。闻刘氏有佳品约百卷归于张君厚，张固刘戚也。李所藏由家属析分各售，不复能聚，谷雏

所得，殆即其类。抑李氏藏品亦有由市贾转售而加以装饰附会者，此亦不止李氏藏品为然。北方敦煌各品，均有仿制，以画壁最为流行，造像次之，经卷最少，以书法不易仿也。间有以真迹剩纸仿写者，其伪易售，然细辨终能别也。谷雏所藏各品，固无疑义，然李氏藏印显系市贾所加盖，木斋无自加藏印以发其复之理，且刻工均劣，较之其藏书印章，判若霄壤，此与书画之强补印章，同为蛇足，明眼所宜辨也。（一九四七年冬）（叶恭绰《矩园馀墨》，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170—171页）

资料8 己巳（1929年）东瀛访书记

〔九月〕十三日至坚甫（白坚）寓，观其新得熹平石经，极佳。又观魏尺、唐尺。

十七日 午后抵长崎。过崇福寺。

十九日 游雌雄泷（注：神户布引之泷）。六点半到西京。

廿四日 到此已五日，坚甫办己事他去，我父子语言不通，困居旅舍，不能出游，烦闷异常，聊书此自遣耳。

十月初四日 余初意先住奈良，缘坚甫所事非西京不办，而余父子均不通言语，需人而后行，故留滞西京至半月之久，掷黄金于虚牝，可惜殊甚。（傅熹年整理《藏园日记钞》摘录，《文献》2004年第2期）

李滂与白坚（补遗）

本刊前期（创刊号）登载了小文《李滂与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之背景》，蒙获诸位指教提示相关资料。此外，笔者自己亦有未曾刊于前期、刊行后才注意到的内容，因此想借本期余纸补充这些内容。

《观堂遗墨》之题签

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自沉后三年半的1930年12月，上海刊行了《观堂遗墨》二卷^⑥。编者陈乃乾（1896—1971），海宁人，与王国维同乡。其序曰：“北方友生既辑其《遗书》为四集，日本博文堂亦印行其遗墨。窃念先生寓沪久、沪上同人得其手迹最多。题跋考证之作，颇有为《遗书》所未采集者。因随时段印，凡得若干种，辑为两卷。”文中所言《遗书》四集，为民国十六年至十七年刊行的《王忠愍公遗书》，后者日本博文堂印行的遗墨，指的是昭和三年（1928）大阪书肆博文堂原田悟郎请神田喜一郎编订的《王忠愍公遗墨》。接下来的这部《观堂遗墨》是在上海出版，不过书写题签的正是白坚（图4）。图为贴于书帙的原题签，可以看到“白坚敬署”吧。但记有白坚之名的仅在此，书册上下卷“白坚敬署”处各自换作“卷之上”“卷之下”。恰巧注意到最近入手的本书有此题签，便于此提出。

这段时间，白坚住在上海法租界的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日之复兴中路）

⑥ 准确的刊行时期不明。今据陈乃乾序“民国十九年十二月”。

桃源村，其寓所称作“汉石经石室”^{⑥1}。那么，白坚答应题签此书，背景是怎样的？白坚生前就与王国维相识，也有很大关系，但并非仅仅如此。若不考虑与编者陈乃乾的交游，则难于说明。陈是编纂了《清代碑传文通检》《室名别号索引》《禁书总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索引》等多种工具书的有名人物，在当时上海大东书局任编辑，同时兼任持志学院、国民大学的教授。这位陈乃乾作有《魏正始石经残字》二卷，并不怎么为人所知。如刊记所云“癸亥十月海宁慎初堂陈氏从上虞罗氏假本影印”，是书乃民国十二年陈乃乾借罗氏所藏而影印出版，由傅增湘题签。如正编注39所述，白坚对石经有不同寻常的兴趣，不仅藏有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之残石，还出版了有关石经的专著。另外，也如正编提到的，1929年9月（即《观堂遗墨》刊行的前一年），白坚与傅增湘父子同行赴日。白坚与陈乃乾不仅都对石经有兴趣，也可推测以傅增湘作介绍的关系。或许他们在上海是同一活动圈内之人吧。似可作为窥见白坚行动的一则材料。

《四翁乐群图》中的白坚

据同僚永田知之助教授指点，知道《四翁乐群图》的画卷中可见白坚身影。这画的是昭和五年（1930）秋，乐群社同仁在京都一乘寺诗仙堂举办雅集时的一个场面，作者为本田成之^{⑥2}。杉村邦彦教授详细的解说并画卷照片，刊载于秋田内藤湖南先生彰显会杂志《湖南》第五号（1985年1月发行），请参看。以下，主要据山村教授的介绍文记述概略，该画中自然绘有乐群社同仁雨山长尾甲、湖南内藤虎次郎、君山狩野直喜、如舟小川琢治四位，此外还可见三位人物。其中一位僧人装束的，也许是诗仙堂的住持，此外，有一位穿洋服，一位穿和服，就成了问题。不过其中着洋服者，推测实际上是白坚。现藏于长尾家的该画卷中，另附有松浦嘉三郎题为“书四翁乐群图后”的四纸跋文，读之很可了解当日雅集的情形。今止摘录该跋文的相关几处。

……（前略去年季秋，辄假座于一乘寺村诗仙堂。堂是宽永年间石川丈山翁之所隐栖，修葺至今，比丘守之。（中略）……此日四先生早晨已到，论学谭艺，霏霏惇惇，议论证据古今，旁及草木虫鱼，其渊其博，真乎有足骇人也。偶有蜀人白君坚甫携坡公《祷雨纪事词卷》而来。批览之，洵为希世之秘



图4 白坚之题签

⑥1 白坚于民国十九年刊行的《汉石经残石集》中有“十八年岁次己巳十二月岁除日，西充白坚识于上海桃源村之汉石经石室”。又，因民国二十五年刊《魏正始三体石经五碑残石记》中有“丙子新秋西充白氏与石居印”。故知白坚亦用室名“与石居”，但时代要稍往后。

⑥2 落款为“昭和六年秋本田成之敬写”，绘画是一年后所作。荫轩本田成之（1882—1945）是在京都大学狩野直喜门下修习经学之人，有《支那经学史论》《支那近世哲学史话》等著。另一方面，私淑富冈铁斋，于绘画研究、创作亦得到公认。

珍。四先生赏观久之，高谈转清，而秉烛不散。（中略）……会毕，遂请同学本田荫轩博士，绘写当日高会之景，以赠守堂者，而为纪念焉云。

此跋文末尾有“昭和辛未（1931）季秋霜降之日，摄津松浦嘉书”，与本田之画同为雅集后约一年所作。松浦嘉三郎（1896—1945），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曾任北京《顺天时报》记者，于京都大学师从内藤湖南，其时为草创不久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当时松浦住在与诗仙堂近在咫尺的一乘寺村下之松，推测他列位该雅集之末席^{⑥3}。洋服的黑边旁边，坐在石上的人物当然就是松浦。本田之笔相当有力量，实际上很好地捕捉了四翁形容之特征。若看本编所载白坚系蝶形领结的照片，那么这里所画洋服人物毫无疑问就是白坚。

我们由松浦的跋文可知，是时白坚带来了东坡的《祷雨纪事词卷》，这也定是要寻找合适的买家吧。但不知归于何人所有。无论如何，此前并不存在1930年白坚到过日本的确证，而据此画可确知，并且证实了之前的推测，白坚几乎每年都到日本来。

白坚致仓石、吉川信札

接下来介绍的，是白坚对于接受《尚书正义定本》之赠予，写给著者仓石武四郎与吉川幸次郎二位的感谢信。该信藏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这也是永田知之助教与斋藤智宽助教在他们使用的哲文研究室发现而通报告知的，洵称相当之珍品的佳物（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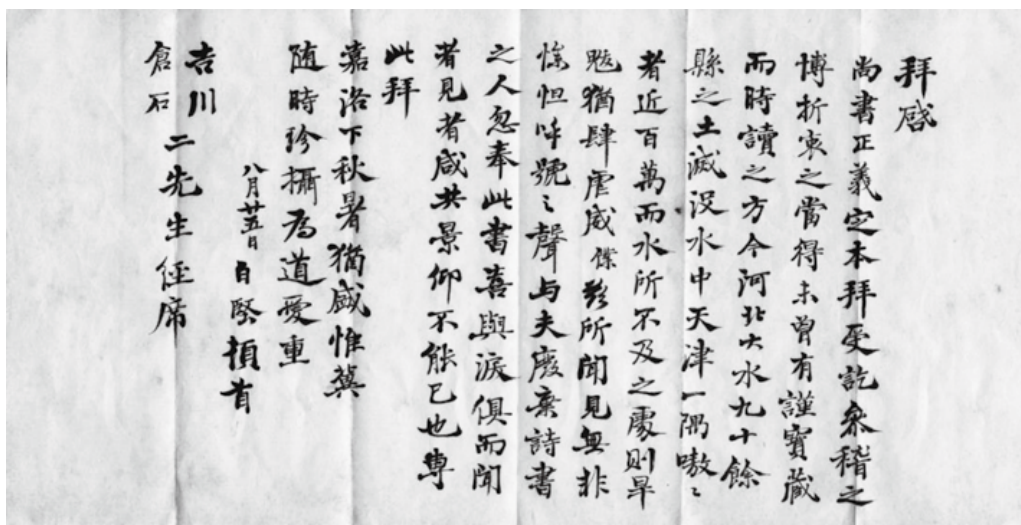


图5 白坚致仓石、吉川信札

并非难读的文字，仅有图版也足够了，但为期正确，还是钞录书简文字于下吧。

拜启：

《尚书正义定本》拜受讫，参稽之博，折衷之当，得未曾有。谨宝藏而时读之。方今河北大水，九十县之土灭没水中，天津一隅嗷嗷者近百万，而水所不及之处，则旱魃犹肆虐威。仆兹所闻见，无非惨怛呼号之声，与夫废弃诗书之人。忽奉此书，喜与泪俱，而闻者见者，咸共景仰，不能已也。专此，拜

⑥3 笔者对松浦嘉三郎亦略有调查，望另有详细介绍的机会。

嘉。洛下秋暑犹盛，惟冀随时珍摄，为道爱重。

八月廿五日，白坚顿首

吉川

二先生经席

仓石

邮戳为“27.8.28”，大概是民国二十八年8月27日。是年河北遭大水灾，该日期很符合此事实。另外，白坚接受赠予的《尚书正义定本》，即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8年后改称东方文化研究所）经学研究室持续十年的《尚书注疏》校订工作告一段落，昭和十四年（1939）7月25日刊行了最初两册（卷一至卷五）。白坚迅速得到了赠本。由正编可见，昭和六年（1931）研究所纪要《东方学报》的赠送者名单上，已有白坚之名，可以想象他在京都的研究所受到的应有待遇。由此书信，更可确认这一点。又及，信封上有白坚住所之印，为“北京南池子缎库普度寺前巷十一号 电话东局三五一”。可知此时白坚已居住北京。

董康致羽田亨信札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史睿氏特地移录同馆普通古籍组所藏“董康信札”中的一通提供给笔者，是董康致羽田亨的书信。现引用部分于下。

……（前略）因台端著作等身，性复嗜古，叠承垂询德化刘氏所藏敦煌经卷，具见关心文献，敦思古之崇情。兹特将详目开呈玄览。德化刘氏，即前清学部大臣刘廷琛，为海内有数藏书家，与李盛铎为至亲。经卷共八十余种，大率首尾完善，较诸李氏所藏为尤精。刘氏在时，曾有人议价五万元，终以未忍割让作罢。今刘氏业已物故，家复中落，倘贵国文化机关有意收藏，将与李氏藏经同有得主之幸。刘氏后人闻之，必欣然乐从。弟亦当极力玉成。原价具在，较之李氏藏经为廉矣。（后略）……

由此书简可知：①羽田对刘廷琛旧藏敦煌经卷感兴趣；②董康向羽田提供了该目录；③与李盛铎旧藏写本一样，怂恿日本“文化机关”购入，等等。特别③很重要，间接证明羽田与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的购入有很深的关联。

那么，这封书信末尾日期是“八月卅日”，究竟是哪年八月？信中有“文旆东来，为谋东亚文化精神团结，昌谟宏议，时于尊俎间欣承云萍契合，殆有夙由”，故可推测该书信为羽田在中国见过董康后寄出。昭和十三年（1938）8月21日起，羽田为出席东亚文化协会创会式而出差中国^{⑥④}，信中所言“为谋东亚文化精神团结”，定是指东亚文化协会。若该推测无误，那么这封信就是同年秋所书。大概其时羽田同董康见面，也谈到了刘廷琛旧藏敦煌写本吧。该时期，羽田对收集敦煌写本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看他所编敦煌写本《新增目录》^{⑥⑤}，即可知诸家所藏陆续归于羽田之手的情状。获得李盛铎写本的羽田，再向刘廷琛旧藏写本出手，也是极为自然的。

附带一言，刘廷琛旧藏敦煌写本几经周折，现归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刘廷琛死后，

⑥④ 《东方文化研究所汇报》第118号，昭和十三年（1938）8月17日。

⑥⑤ 写本。羽田在获得李盛铎旧藏写本后也继续收集敦煌写本，将这些逐一记录入该目录。

写本先经亲戚张子厚之手，其后被吴瓿购入。因吴瓿战时任华北临时政府内务总署署长之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敦煌写本便作为汉奸逆产被国家没收了。其经过详见尚林氏一文^{⑥⑥}。最终，刘廷琛旧藏敦煌写本并未入羽田之手。

李滂与白坚（再补）

李盛铎第十子、母亲是日本人横沟菊子的李滂，由古董经纪人白坚斡旋，于1935年将李盛铎所藏敦煌写本悉数转卖日本的经过，已在本刊第一号中详述。但有关李滂的经历，多有不明之处，特别是有关其二战后的动向则完全不知。

不过，2010年12月，恰巧笔者在北京期间，承蒙金融时报社的艾俊川氏慨允借阅其所藏全部有关李滂的资料（以下称“李滂文书”），由此可得关于李滂生平的一些新信息^{⑥⑦}。该资料内容为李滂的著作、书信、日记等，但几乎全是未经整理的草稿之类，甚至可说是废纸。当然完稿很少，但其中包括1948年李滂自己写的履历书（下揭图6），据此可知极为有趣的事实。因此作再补，介绍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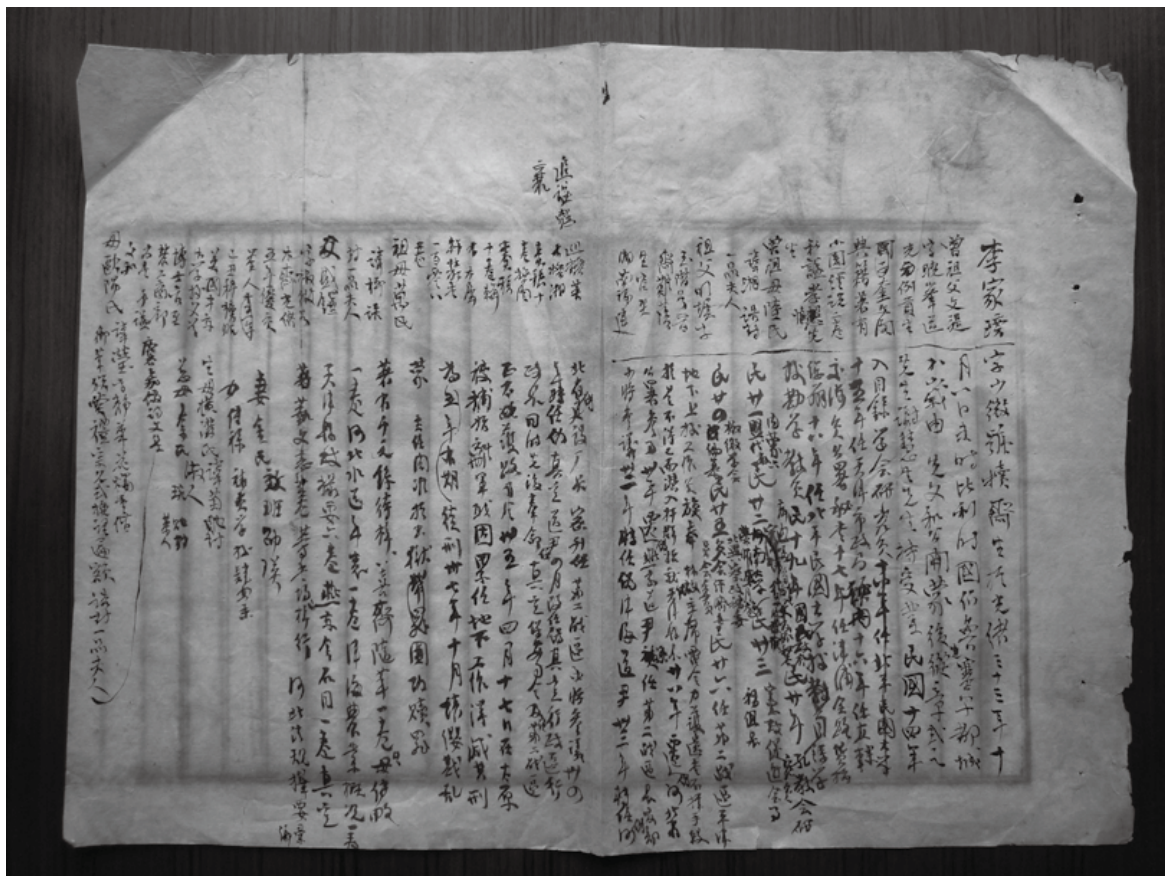


图6 李滂履历书

⑥⑥ 尚林《刘廷琛旧藏敦煌遗书流失考》，《汉学研究》第12卷第2期（1994年12月），345—357页。

⑥⑦ 与艾俊川氏相知，是老朋友王丁氏介绍。这次，对提供所藏贵重资料的艾氏致以满腔谢忱的同时，也借此机会对王丁氏表达谢意。

首先，将此履历书移录于下^{⑥8}：

李滂，字少微，号犊斋，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八日未时比利时国伯鲁塞尔都城。八岁由先父和公开蒙，后从章式之先生、谢慧生先生持受业。民国十四年（1925）入目录学会研究员，十五年任天津市政局秘书，十六年任直隶交涉员公署秘书，十七年任津浦全路货物总办，十八年任北平民国大学校目录学校勤学教员，民十九年国民政府……（中略）秘书，民廿年孔教会研究员，民廿一内蒙六盟代教，民廿二河南大学作□月游，民廿三宪政促进会事务组长，民廿四椒微学会编纂，民廿五“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民廿六任第二战区平津地下上校工作员，旋奉林故主席电令，力护遗书，不择手段，于是不得已而潜入扞（奸）群，抬（始）就伪天津县长。廿八年迁伪河北省公署参事，卅年迁伪燕京道尹，实任第二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卅二年转任伪津海道尹，卅三年转任伪河北省建设厂长，密升任第二战区中将参议，卅四年转任伪真定道尹，四月改任伪真定行政区行政长，同时先后奉命任伪真定保安司令及任第二战区石太护路司令，卅五年四月十七日在太原被捕，始离军职，因累任地下工作得减其刑，为期五年徒刑，卅七年十月靖纓（请纓）戡乱，蒙主任阁（周）准予出狱，图功赎罪。

著书《千元录》待梓，《八喜斋随笔》一卷、《母传略》一卷、《河北水道年表》一卷、《津海农业概况》一卷、《天津县政撮要》六卷、《燕京金石目》一卷、《真定艺文志》一卷等书，均梓行。《河北法规择要汇编》^{⑥9}。

照形式，最初记有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即李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八日未时（下午两点），出生于父亲赴任的比利时首都伯鲁塞尔（译者注：今称布鲁塞尔）。李滂文书中还有《邺亭忆旧录》（只写有七行片段）（图7），其中也详细记录了“予于光绪三十三年岁在丁未十月初八日未时（公历一千九百零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生于比国使署，日本横沟氏出”。该出生年月日及出生地此前也已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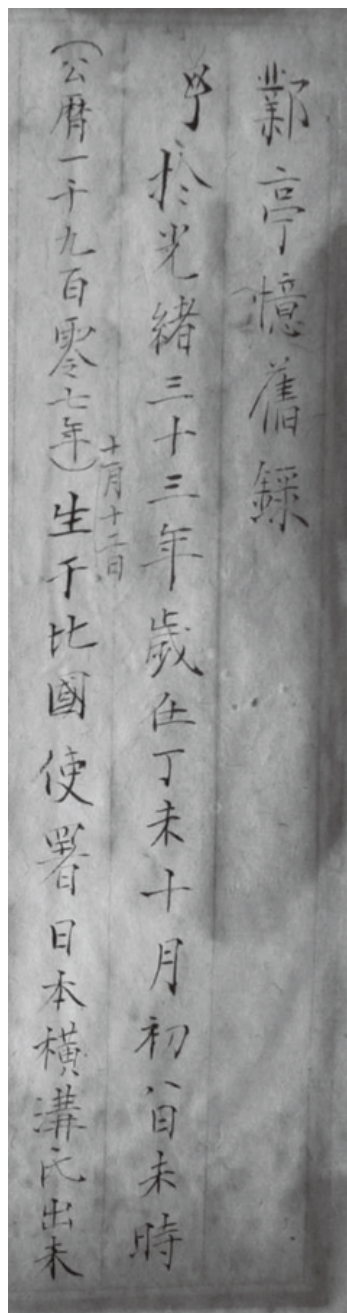


图7 邺亭忆旧录（部分）

⑥8 该履历书亦为草稿，增删很多。无法辨读的文字以□标示。小字“伪”为后来添加。上栏所书李家谱系列举了曾祖父文湜及曾祖母陆氏、祖父明墀及祖母万氏、父盛铎及母欧阳氏的字号、官职、著作等，履历书本身及著作一览的末尾举出李滂之妻金氏及女之名、生母横沟氏、慈母秦氏之名，此处省略。

⑥9 最后一书为后来补入。

但这份履历书还写了迄今不为人知的许多事情，因此虽有重复上文之嫌，还是依次来看李滂所述吧。

李滂晓事以来，首先随父李盛铎习文字。所谓和公，即李盛铎，谥文和公。清亡已久，世人也鲜少如此称呼李盛铎。李滂特地如此称呼其父，不得不认为，此人还是怀抱着特有的保守心情。

接下来，学从章式之。章式之本名章钰（1865—1937），苏州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据说辛亥以后侨居天津，因此说师从此人，大概是确切的。章钰亦为校勘学者。正如“少微先生幼承家学，性好读书，尤精目录版本之学”所云^⑩，李滂后来有志于此，多因父亲李盛铎的涵养，但推测亦有此人的影响。而后举出的谢持（1876—1939），字慧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大人物，但蒋介石上台后逐渐失去影响力，也曾住在天津租界。李滂大概是这一时期跟他学习的。

民国十四年加入目录学会，已知李滂十岁之后在这方面就有很强烈的兴趣，而另一方面，也可见他怀有很强烈的自负心。职历以民国十五年（二十岁）任天津政局秘书为始，十六年（二十一岁）为直隶交涉员公署秘书，十七年（二十二岁）为津浦全路货物总办，十八年（二十三岁）为北平民国大学校目录学校勤学教员，十九年（二十四岁）为国民政府某部署之秘书^⑪。担任民国大学教员一事此前已知，但其他经历是此次始知的情况。

再接下来，民国二十年（二十五岁）为孔教会研究员，二十一年（二十六岁）为内蒙六盟代教，二十二年（二十七岁）受聘河南大学讲课。二十三年（二十八岁）为宪政促进会事务组长，二十四年（二十九岁）任椒微学会编纂。孔教会是以清朝遗老为中心的复古团体，成为该会研究员，其父李盛铎的影响应该很大。椒微学会有何活动并不明了，不过自然是尊李盛铎为领袖的团体。六盟即清朝实施的内蒙古行政组织，其下有四十九旗。若所谓的代教是代理教师的话，那么一时李滂也曾赴任内蒙古。河南大学在开封，此数年前改省立河南中山大学为省立河南大学。是应当时国文系主任邵瑞彭（字次公，1887—1937）之聘。履历书中，“月”之前的字难以辨读，但可以想象并非多长的时间。其时的讲义《近世藏书家概略》后来公开刊行^⑫。从事教职的同时，也参与宪政促进会等，可知他很早就涉足政界。这段时间原则上填写有每年的职历，但不一定每年都变换职业，应该是分别列举就任之年。因此，有时是学会会员，有时是官职，有时是教职等，种类各不相同。

民国二十五年（三十岁）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大概可认为是这种志向的延续。“冀察政务委员会”自然是日本压力下在华北设立的行政机关，就任该会委员，决定了其后李滂的命运。次年（三十一岁）“任第二战区平津地下上校工作员，旋奉林故主席电令，力护遗书，不择手段，于是不得已而潜入奸群”，在笔

^⑩ 据李少微演讲《近世藏书家概略》之首所载邵次公介绍词。《进德月刊》第2卷第9期（1937），123页。此文献承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图书馆）史睿氏惠示。在此谨致谢忱。

^⑪ 此处前后文字难辨。

^⑫ 《进德月刊》第2卷第9期（1937年5月）及第10期（1937年6月）。

者听来，总觉得像遁词，而实际到底所指为何？所谓林故主席，大概是林世则（1894—1937），同为位居冀察政务委员会枢要之人物。因第二战区是国民党设置的抗日战争之战区，那么所谓地下工作员，也应该是国民党工作员的意思吧。此外，略显突兀的“护遗书”之目的，或许是在说李家的藏书？李滂于1940年将李家藏书全部卖与当时所谓的伪北京大学，是广为人知的事实。总之，李滂在这一年就任天津县长。以下，李滂在该履历书中主张，自己作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员潜入敌方，假装就任敌方官职。

如此，二十八年（三十三岁）调任伪河北省公署参事，三十年（三十四岁）调任伪燕京道尹，据说实际是任第二战区长官部的少将参议。三十二年（三十六岁）转任伪津海道尹，三十三年（三十二岁）为河北省建设厂长，（国民政府一方的职务有）秘密升任第二战区中将参议。三十四年（三十八岁）升任伪真定道尹，同年四月改任真定行政区行政长，此外，相继担任真定保安司令及第二战区石太护路司令。这些战争时期的任官履历中，伪天津县长与伪燕京道尹等是迄今已知的，而其他大部分经历都是由该履历书才从新弄清。

如此，因在战时就任敌方官职，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三十九岁），于太原被捕，宣告服刑五年。如果该时期是作为地下工作员潜入敌方，那么并不清楚何以被问罪。至于李滂为何不得不如此书写，似乎只有从该履历书是为了什么、又是为了提交至何处而写这两点来推想。

其后，三十七年（1948）十月（四十二岁），以“请缨戡乱”之理由而出狱。总之，可想象因国共内战情势迫切，不待刑满即被释放。服役两年半，恰当刑期一半就出狱了。以李滂战时的经历，大概也能想象战后被追究责任，果然，从这份履历书，可以清楚明白他被逮捕服役。且刑期半途被释放，亦为全新的认识。遗憾的是，因履历书只写到释放为止，当时四十二岁的李滂，后来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仍然不明。可即便知道了，或许也没什么意义。

李滂文书中，除履历书之外，还有《东行棣录》（图8）。是记录李滂日本旅行的日记，存有庚辰九月十九日至廿八日的部分。庚辰年为1940年，是年十月，李滂终于访问了生母之国，也去为母亲扫了墓。该日记虽只到李滂尚在中国准备出发的部分为止，但迄今仅知为传闻的李滂赴日时期，因该材料而得以明晰。如果留有旅居日本期间的日记，应该会相当有意思的记录，可惜不得如愿。

而通过该日记，亦可知几件事情。那就是李滂携妻同行，其妻名金秭。九月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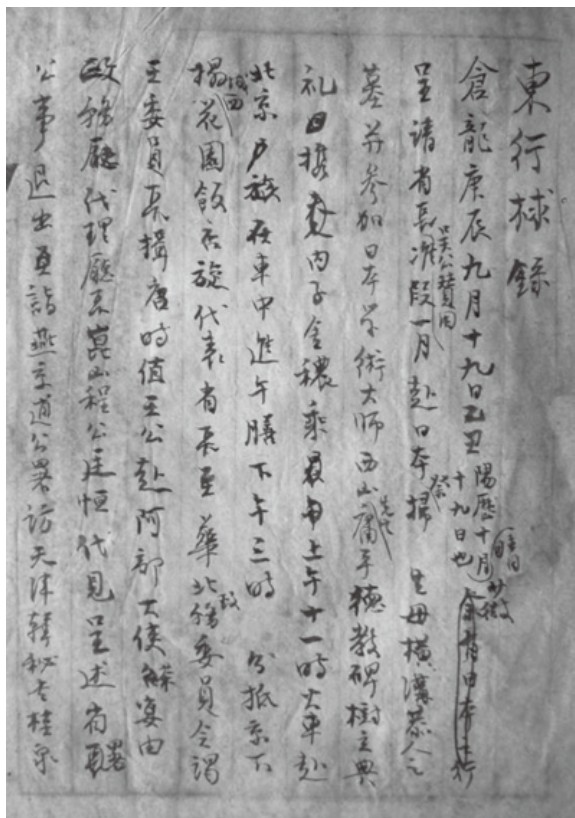


图8 东行棣录

日，李滂自天津往北京，礼节性拜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等要人的同时，并办理旅行证明手续，还拜访了东方文化委员会的桥川时雄、董康等学者。二十日仍是礼节性拜访，此外在七兄、八兄等亲族家吃饭。二十一日拜访傅增湘，获赠新刻《藏园群书题跋续记》。此后，连日都继续这样的记载，文烦从略。原文附于文末，请参阅。二十三日，夫妇回到天津。办理交付旅行证明书稍费时日，出发日期不得不再三变更，最终决定二十九日出发。二十七日祭拜了父亲所葬的义园，汇报此度东行。今存日记终于此。

李滂赴日固以祭扫生母之墓为目的，但此外还为参加称颂“日本学术大师”西山庸平德教碑的落成典礼。大概这是正式的主要工作，而以公务出差之机祭拜生母横沟氏之墓。当然，对李滂而言，还是扫墓更重要。西山庸平（1872—1939），四国高知人，长期任小学校长，基于杜威理论，开发实施了西山式学习指导法。多有教育学相关的著作，于李滂赴日前一年，昭和十四年（1939）十二月九日去世。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书写“行修名立”之匾额，托与李滂。在此背景下有怎样的事情，笔者并不知晓。

另外，李滂似乎出版了当时的旅行记^{⑦③}，名为《扶桑瞥观掇纂》，遗有如下序文。

扶桑瞥观掇纂序

先文和公薨后四年，岁次庚辰十月之初，少微呈请省长吴公给假一月，整装东行，展扫生母横沟恭人之墓。彼邦名儒时彦来与辱交，复幸旧刊名钞秘册得一阅览，记其大概，勒而成编，厘为二卷，命曰《扶桑瞥观掇纂》。付于聚珍印行，用代钞胥，以赠同好，兼志鸿爪。禹域绝续之交，文物久矣屣弃殆尽，远涉重洋，观光三岛，人文之盛，叹为观止。中日同文提携，似难缓图云尔。

孔子纪元二〇〇〇年仓龙辛巳正月中浣五日，河北省公署参事大兴李少微序于保阳延寿寺右寓居。

我认为，以上对于李盛铎第十子李滂的身世，据李滂文书得到了若干简单却全新的认识。若能添补先前所草之文，则属幸事。

附录 东行掇录

仓龙庚辰（1940）九月十九日乙丑（阳历十月十九日也）^{⑦④}，晴。少微呈请省长吴公赞周准假一月，赴日本祭扫生母横沟恭人之墓，并参加日本学术大师西山先生庸平德教碑树立典礼。携内子金穰乘上午十一时火车赴北京，在车中进午膳。下午三时 分抵京，下榻城西花园饭店。旋代表省长至华北政务委员会谒王委员长揖唐，时值王公赴阿部大使茶宴，由政务厅代理厅长昆山程公廷恒代见，呈述省署公事退出。诣燕京道公署，访天津韩秘书桂泉，托其携省署公文往日本使馆及满洲通商代表处加盖旅行证明书关防以便往还。复往（*栏外插入：东方文化委员会访桥川子雍兄时雄，告其石门特

⑦③ 不知实际是否出版。笔者并未见。

⑦④ 是年九月十九日不是乙丑，而是乙未，乙丑是十月十九日。想来大概是因这年阴历九月一日恰为阳历十月一日，虽用干支计日，却误用十月之历吧。

务机关长石田中佐对钜鹿县发掘大物事，嘱其约日考古家前往开办云。伊言对先和公生前琐记，从其日记录出，已成钜册，将来刊行，其意殊可感也。宣南武进董绶金年伯处辞行，谈甚久。近日董年伯有《昆陵董氏汇刻词集》之举。又往常熟沈公职公处辞行，旋至七兄处晚饭，归旅馆已夜半矣。阅日本法典。

九月二十日丙寅，沉阴，着重棉犹寒也。往七兄处午饭，谒南长街森冈长官邸，值其公出，留名刺辞行，又往谒吾乡钮公传善，谈甚久。又至八兄处，旋回七兄处。晚携内子及棧侄往西单半亩园食羊肉，饭后至姐丈章子怡处长谈。姐丈对防共问题颇有深究，当前最要之举也。步归旅舍，程公廷恒来访三次，均值相左，歉甚。阅明袁中道《游居柿录》。

九月二十一日丁卯，晴，仍寒。访江安傅沅叔尚书。增湘尚书以近刻自著《藏园群书题跋续记》六卷见贻。晚赴殷亦丛邸中公聚、孝感盛朱厅长兆熊之宴，旋至八兄处，兄嫂宴我夫妇也，归已夜半。阅《藏园题跋》。新民会金尔功来，值余出门未晤。

九月二十一日戊辰^⑤，晴。晨九时程公廷恒来言王委员长知余赴日参加西山先生德教碑树立典礼，王公赠其匾额一方，嘱余携往云。晚钮公及其谢夫人在其家宴我夫妇，归已十时矣。阅董年伯所著《书舶庸谈》。

九月二十二日戊辰，晴。宁晋王令启文来，未见谈。职公处晤朱厅长兆熊、加藤先生正义，旋与朱公往市楼薄酌，即归。椿侄来言韩秘书嘱其告余先赴天津，旅行证备妥寄津。余即整装定明晨启程，后至职公处辞行，至七兄处晚饭归。

九月二十三日己巳，晴。携内子乘十时三十五分火车，下午一时车抵津，乘车至须磨街寓所。七兄来津已一周矣，旋与七兄往访横山大弟初美谈赴日诸事，又访加藤师，不值。诣李鹤仙兄，坐半时即归。估人贾侄携宋本《友林乙稿》求售，索值太昂，还之。

九月二十四日庚午，晴。加藤师来谈。武清穆荃忱秘书、仪征方孝吾科长来谈县事，交代诸事，均已清楚，迺是外来之功也。午后往河东抱一龛访门胁先生商量东行诸事。原定念六启程，后改十一月二日，现又定本月廿九。归作书，分致程参事及韩秘书催取旅行证书。命孟仆宪章往京投送，倘不果廿九行期，又不能成行。晚间作日记五页。得省署秘书谢四石书，并将横山大弟电报催余来津。

九月二十五日辛未，晴。得程参事信，寄来旅行证，接孟仆自北京电话言程公代办旅行证已邮寄津矣。往丰太公司晤加藤师及横山商洽赴日诸事，携内子往市购置旅行诸物。晚饭后□润张太世丈志激派车接往其寓，告余明日赴保就财政厂长任，归已深夜矣。得程参事书，附来王委员长赠西山公匾额一方，文曰“行修名立”。

九月二十六日辛未，晴。往横山及王相六法师，均值公出不晤。又往山阴周孝怀，叠访建德周公孙暹，谈片刻辞归。晚周孝老宴门胁先生，招余往陪，同座有横山、加藤、小林三公。盖孝老弟三世兄欲携往日本求学。作书上省座。仪征方孝吾、闽侯甘榕人来，均出门未晤。

九月二十七日壬申，晴。访门胁商董东行事。晚间故吏及旧雨为我饯行，即墨段大令来。王委员□任来谈戴朗轩本月四日在汉口被刺、现在吾赣省政问题，讨论颇详。诣浙江义园，祭先文和公，告此次东行也。

^⑤ 原作“二十二日”，李滂自行订正。之后至二十六日，均据订正。于是，二十一日的记事就重复了，所书内容若为同日，则不可解。该归于何日，有待检讨。

九月二十八日癸酉，晴。穆荃丞、方孝吾、郑少卿来，椿侄自京师来。剃头沐浴，往加藤处此行。方若老来，因出门未晤面，颇歉然。

李滂与白坚（三补）

日前有机会出席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召开的“敦煌遗书的现状与研究”学术演讲会^{⑦⑥}。此次演讲会的副标题是“《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艺术》出版志庆”，是为纪念史语所所藏敦煌遗书图录的正式出版而举办的活动。演讲之前，李亭佑氏作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工作报告”，回顾了史语所与敦煌遗书的关联，以及本次出版的经过。其中得知有关李滂的意外事实，特别记录于此。老实说，这在笔者是始料未及之事，略有猝不及防之感。问题是下面这封1929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1896—1950）写给李滂的书信原稿，虽稍有过长之嫌，但考虑到其重要性，还是想不予省略，抄录全文如下。这封信已收入近年出版的《傅斯年遗札》^{⑦⑦}。

少微先生执事：

昨日承教，佩荷何极。比想 兴居百福为祝。寅恪先生与弟商延聘先生加入敝所事，得下列之意见，谨述其概，以供采择。

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之意义，大略如附上一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所说，此意不敢自以为必是，然此日为此学问，欲对欧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国前修而不惭，必于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后可以后来居上，故敝所设置之意，无非刊布材料，供之于人，整理材料，以为结论，但为客观之业，不作一家之言，凡共此好者，皆同志也。故一切计划、设施，乃至一切支出，无不公开，无非欲聊尽此时之责任，以求不负此日国家缔造之会。先生以家学夙业，不我遐弃，欣幸何极。名义拟即用“特约编辑员”，董彦堂、徐中舒、赵万里诸先生皆此名义，已向院中请发聘书。“专任编辑员”，常川驻所，不得^⑦兼职，月薪百五十至二百五十；特约者，例无，然如有一定之工作，可支津贴若干。此时敝所事浮于费，在举行中之事业，不下十数，（如方言调查、人类学调查、安阳发掘、整理档案等。）而院中又限制薪俸，绝不许过预算之半，故目下极感拮据，其丁山先生一部事，目下竟无款支付。（日内油印现下实支情形，当寄上一份，现亦可到敝处取观。）然在人先生一事中，寅恪兄与弟当竭力筹之。

伏思此日盛业，为刊布秘笈，及其他材料，此不董敝所之祈求，亦造成风气之惟一途径。远者不必论，即如近日罗叔言先生之功绩，无不在其刊布新获材料之中，此不可以哗众议之。十五年中，中国学问能开一新面目者，此种刊

^{⑦⑥} 2013年12月10日。

^{⑦⑦}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全3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10月。该书信在第一卷，243—245页。

行之效也。然罗君收藏不富于尊府，先生少年积学，见畏于罗君，如于尊府所藏各类品物，以及秘卷宝笈，为之影照刊印，校订考正，则今后风气，不采于人先生，又何属焉！此非董一人之荣华，抑亦世代之盛业。寅恪兄及弟盼人先生于此一条陈有所采纳，果能以类相从，编为单册，以新式之印术，成精致之刊本，合严整之考定于本来之面目，例如敦煌卷子、魏唐石刻……之类，标目为尊府所藏，署名为先生所撰，罗君老者，当羡慕之。研究所所负之责任，为垫发印费，版权收入仍属于作者，若考证上有时需用襄助，研究所同事当尽其所能，且材料均不必交所，由人先生在家自雇人影印抄编，由所支费，即可。如此，可省遗失之虑，在敝所亦可减轻其责任。综约言之，人先生自编，于一定期间，如一月或二月交稿一次，并将内容大略与所商定，俟交稿及商定后^b所中即为先生付印，再与商务印书馆等定一契约，为之代销，其版权所得，壹以归之著者。如此似嫌研究所何以但任其劳，实系弟等素志，切愿因新材料之刊布，使中外学人得新知识，得广眼界，而成实事求是，益扩材料之任风气耳。人先生为此项编定，每月必销磨若干时日，所中当赠月津五十，为数至少，甚为惭愧。然此日院中迫于需要，鼓动刊印，限制薪水，正无奈何，但杏佛先生谓夏后预算当增若干，宜徐图耳。如何，请与寅恪详商，并愿驾返天津前，弟获一趋左右也。匆匆，敬颂

著安。不备。

弟傅斯年启

木翁老先生处同此，敬颂 康安。

a) 陈寅恪附注：“拟加此数字，尊意如何？”

b) 陈寅恪附注：“拟加此数语，尊意如何？乞酌。”

这封书信中，傅斯年对李滂说明了几项条件，劝说他就任史语所“特约编辑员”。特约编辑员原则上并无报酬，从李家藏品中自由选定敦煌卷子、魏唐石刻等题目，以李滂名义出版。印刷经费由研究所负担，但版权及收入归作者所有。如有必要，也不吝研究所同僚的援助。另外，并无必要将所藏资料提交所内，在自家进行操作，雇佣影印、抄写人员时，所里负担经费。并讲明每月有五十元津贴。

李滂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八日，因此其时尚未满二十二岁。这一年是民国十八年（1929），据说他是北平民国大学目录学校勤学的教员^⑦，乃一介无名学子。光听这个，就是破格提拔，实可谓条件不恶。但这种劝说的真正目的，比起作为学者的李滂自身，更在于李家的藏品，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不知是反伤了李滂的自尊心，或

⑦ 据李滂自撰履历书。参《李滂与白坚·再补》。

是出于父亲李盛铎反对^{⑦⑨}，真相虽难明，但无论是因哪一条，此事并未谈成^{⑧⑩}。

这封信并无直接说明年代的信息。但《傅斯年遗札》的编者将之归为1929年，大概是正确的。因为恰好这一时期李滂自己也写有日记，可见应是关于史语所招聘之事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日记，虽仅是李滂文书中题为《友语录》的几页残稿^{⑧⑪}，当中却能见到以下记录：

六月廿日（阳历七月廿七日）聊城傅孟真先生斯年邀 家大人饮于什刹海会贤堂。予侍，并有杨杏佛（杨子木观察文孙）、朱遏仙、董○○、周□□^{⑧⑫}、翁有麟、陈寅恪、赵万里。家大人与朱先生谈其所藏钞本郦注《水经》，劝其景印，并言戴注水经虽精，乃非旧传面目。此事甚重大，须速印不可云。予在旁怂恿之。饭毕，家大人先归，予同杨朱董周傅陈诸公往午门历史博物馆，见陈列有钜鹿县出土之桌椅各一及门板数块，某定为北宋时物。予曰，此乃道地的宋板。杏佛先生徐徐曰，如将此板刻成《康熙字典》，前人讥语，今成事实，岂不快哉，众大笑。又登端门，楼中有大钟，一看管人将门打开，予等进室中，其中有不可言之奇味，赵万里曰，此味如海鱼虾之兴味。予促之曰，速走，速走。予隔夜饭将要出矣。众笑下楼而散。

是日陈寅恪言，有人藏有明板黄大兴《梅苑》？予曰，此书有二本，一为曹寅《楝亭十二种》本，一为武进李氏（祖年字搢臣）圣泽楼刻本，附刻有勘勘记。又今春见傅沅叔得刻本，板心绝似文选楼刻，本书惜无刻书姓名及年月。然以刻工可定为嘉道间刻本也。明板，予未之见过，诸家书目亦罕有明板，惟陆氏目有汲古景钞宋本。朱遏先言，奉天某军人得西夏文字数箱。予曰，此事今春已闻友人谈及，其中以《妙法莲华》等经为多数云。朱曰，今已归三集团军人，现运至东交民巷某处存放，有人出五千元，尚不售云。

这里摘录的当然只是《友语录》的一部分^{⑧⑬}。未举出的残稿开头，有“己巳”（1929）干支，所幸可知是同年之事。是年阳历7月26日^{⑧⑭}，傅斯年宴请李盛铎。地点在北平什刹海会贤堂，是有名的高级饭店。这一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从广州移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同席者有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杨铨，1893—1933），朱遏先（朱希祖，1879—1944），陈寅恪（1890—1969），赵万里（1905—1980）等人，李滂

⑦⑨ 1935年，白坚赴日寻找李滂母亲时，相关新闻报道中，可见京大教授羽田亨曾劝李滂提交博士论文，但父亲说还年轻，等研究更深入一些。参《李滂与白坚》正编。虽不明真实情况，但可知李盛铎很留心李滂的为人处世。因1934年初李盛铎去世（王菡《藏书家李盛铎卒年辨正》，《文献》2010年第4期，191页），即便真有此事，到1935年时，也属从前之事。在比这更早的1929年，大概李盛铎并不会轻易许可史语所的这件事。

⑧⑩ 也不知史语所是否藏有李滂给傅斯年的回信，如有，至少能知道辞退的表面理由。有待今后调查。

⑧⑪ 这里所说的李滂文书，是指现居北京的艾俊川氏所藏李滂的全部草稿。同样请看拙文《李滂与白坚·再补》。

⑧⑫ 董○○、周□□，或因李滂只记得姓，故《友语录》稿本中如是书写。董○○很可能是董作宾，周□□不知何人。

⑧⑬ 但这是六月廿日的全部记录。

⑧⑭ 李滂在六月廿日的日期旁自注“阳历七月廿七日”，但实际应该是早一天的7月26日。如今从华历，是日为阳历7月26日。

亦同席。这年三月，史语所刚购得李盛铎所藏明清档案，此日招待，应有谢礼之意。

正如众所周知者，民国十一年（1922），历史博物馆将所保管的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卖与同懋增纸店，即将被碎为造纸原料；因罗振玉以私财购入，尽管艰难，还是免于湮灭。这就是所谓的“八千麻袋事件”。其后，罗振玉将其中一部分出版了十册《史料丛刊初编》，不过民国十三年（1924），除留下若干之外，余者全部转卖与李盛铎。傅斯年已于1928年9月11日恳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购入李盛铎所藏明清档案⁸⁵，不久由马衡中介，支付价款一万八千元，便如愿以偿。实际上，档案从天津李家移送北京午门楼上是在这年九月，派遣徐中舒担当此事⁸⁶。

创立不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倡利用“直接史料”（一次史料）⁸⁷，并锐意收集。内阁档案的收购自然也是其基本方针之一环。1925年7月，王国维（1877—1927）于清华研究院进行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著名演讲⁸⁸，其中作为近年重要的新发现，列举了“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城（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以及“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无论何者，皆给予了匹敌古代孔子壁中书或汲冢书的极高评价。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之时，王国维已去世，但史语所对“直接史料”的重视，显然能看出受其影响。对这些新史料的收集及整理公布付出绝大努力、培养新学问风气的最大功劳者，是王国维的老师、协作活动的罗振玉。傅斯年在致李滂的书信中说“罗君收藏不富于尊府”，若这些藏品以李滂名义出版，还使用了“罗君老者，当羡慕之”的词句，当然这是游说的言辞；而特意言及罗振玉之名，另一方面亦证明傅斯年是如何高度评价罗振玉之功绩的。同时，能感到今后史语所欲承担王国维所示路线、进一步发展的愿望。

在这样的形势下，史语所对包含敦煌遗书在内的李氏藏品给予很大的关心，也是理所当然。傅斯年致李滂的书信，已知底稿在陈寅恪手中，是在与陈寅恪紧密联络下所写。1928年10月，陈寅恪致傅斯年书信中，从赵万里处听说“李木斋亦藏敦煌卷子甚佳者，秘不示人”，故而陈获知李盛铎处所藏敦煌遗书，似在这段时期⁸⁹。那么，当时史语所陈寅恪的立场与敦煌遗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史语所尚在广州时，编制是：（一）史料学组，（二）汉语组，（三）文籍校订组，（四）民间文艺组，（五）汉字组，（六）考古组，（七）人类学组，（八）敦煌材料研究组⁹⁰，陈寅恪负责史料学组，敦煌材料研究组的负责人是陈垣（1880—1971）。民国十一年（1922）春，担任教育部次长的陈垣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后，立

⁸⁵ 1928年9月11日傅致蔡元培书信，《傅斯年遗札》第一卷，147—149页。

⁸⁶ 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明清史料》第1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十九年9月。

⁸⁷ 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第十分（1928）。

⁸⁸ 演讲原稿发表于《学衡》第45期（民国十四年9月），亦载于次年《科学》第11卷第6期（民国十五年6月）。

⁸⁹ 《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20页。并参照永田知之《陈寅恪论及敦煌文献杂记：以利用途径为中心》，《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6号（2012），227页。

⁹⁰ 1929年1月6日傅斯年致蔡元培、杨铨（杏佛）书信，《傅斯年遗札》第一卷，176—180页。1月10日致蔡元培书简中也是同样的构成，《傅斯年遗札》第一卷，182页。

即敦促馆员俞泽箴着手编纂馆藏八千余卷敦煌遗书的目录，逾三月告竣。又在十三年（1924），以叶恭绰（1881—1968）为发起人，在北平设立了敦煌经籍辑存会^{⑨①}，整理旧稿，命名为《敦煌劫余录》^{⑨②}。该目录后由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出版^{⑨③}。因此，在这一时期，委任陈垣担当敦煌材料研究组的决定，也是再当然不过的。

另一方面，陈寅恪在这一时期于北平图书馆热心调查敦煌卷子的同时，还在清华大学讲授敦煌文献^{⑨④}，可以说这是陈寅恪一生中最亲近敦煌文献的时期。而历史语言研究所转移北平后，改换编制，此前的八组制改为史学、语言、考古三大组制，陈寅恪担任史学组主任。当然，敦煌文献也归入其管辖范围内，同时，陈垣所编《敦煌劫余录》的出版亦成为史语所的正式事业。该目录于1931年出版时，陈寅恪写下有名的序文，也是职务上的责任。

在新体制下，陈寅恪更须获得敦煌文献，想到李家写本，并无甚可怪。而李家不仅有敦煌文献，还有其他重要丰富的收藏。为了经史语所之手公开刊行其精华，陈寅恪与傅斯年开始计划招聘李滂，也是自然趋势。而成为契机的，大概就是李滂《友语录》中所见的宴请吧。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之前就由史料学组负责，因此购入也应由陈寅恪担负直接责任。购入决定之际，招待李盛铎的宴席上，所长傅斯年与陈寅恪出席，乃理之当然。但因此有机会与李滂相见，并与这项招聘计划相关联，则或许略有些偶然要素。

李滂在李盛铎熏陶下成长，很早就于目录学有超乎常人的知识。宴席上对陈寅恪的询问，胸有成竹，倾尽所学，大概连陈寅恪也吃惊。聘请这位青年、公开刊行李家史料的想法，大概是此时浮现的吧。于是与傅斯年商谈，开始计划实行。若是如此，傅斯年的书信，就是宴会后，1929年阳历7月27日以后寄出的。且看最后的“愿驾返天津前，弟获一趋左右也”，必是李盛铎与李滂从北京回天津之前的事，那么应在七月末几天之内。

李盛铎旧藏敦煌遗书，在之后的1935年，由武田长兵卫的资金援助而为羽田亨收购一事，如今人尽皆知^{⑨⑤}。但之前史语所曾有此尝试，却几不为人知。故于此略缀数言。

本文日文版原刊《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创刊号（2007年3月），1—26页；第二号（2008年3月），185—190页（补遗）；第六号（2012年3月），283—290页（再补）；第八号（2014年3月），217—223页（三补）。中译本经作者授权。

（廖明飞 校译）

⑨① 有关敦煌经籍辑存会的设立年代，有几种说法，今据陈垣之说。关于异说，请参照孙玉蓉《“敦煌经籍辑存会”设立时间探求》，《理论与现代化》2008年第4期，106—109页。

⑨② 陈垣《敦煌劫余录》自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1931年3月。

⑨③ 陈垣《敦煌劫余录》自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1931年3月。

⑨④ 永田知之《陈寅恪论及敦煌文献续记：遗墨〈敦煌研究〉与讲义〈敦煌小说选读〉》，《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八号，83—104页。

⑨⑤ 拙文《李滂与白坚》正编。

Li Pang and Bai Jian: How were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f Li Shengduo Brought to Japan

Takata Tokio (translated by Qu Yandan)

In 1936, all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owned by Li Shengduo were sold to Haneda Toru by Li Pang, Li Shengduo's tenth son, through an antique dealer named Bai Jia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races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case, with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biographies of these two figures. Amo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kept in Japan, Li Shengduo's collection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erms of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The case offers also the key to an understanding how Dunhuang manuscripts were brought to Japan. Three supplementary notes are attached to this article.